

广厦

中国与新世界秩序研究

SOME THOUGHTS ON CHIN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乔卡特 著 石沉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双亲 Francis Galt Carter 和 Sylvia Carter,

和岳父母 何燕凌 和 宋琤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写在前面

我们所在的社会正在从家族、部落、国家逐步演化到达一个世界共同体。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都在为创造这一全球大家庭而努力着。

全球化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人类向往已久的成熟阶段。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实际上，人类社会是否能健康生存下去，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

如果中国在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潜在资源，那么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的成熟过程与潜在贡献就是很重要的，它会有益于我们面对人类向成熟期发展所遇到的挑战。

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在大家面前：当对现代化的定义越多地包含了对精神发展的重视（不仅仅着重于物质发展），中国对此的潜在贡献就越明显。

本书包含了我本人的一些想法，同时汇集了他人对于这个题目的论述。我希望本书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一样，日后还有机会不断地丰富、修正和完善之。

目 录

I 人类的成熟

- 1.1 一个全球性的过程 3
- 1.2 内在与外在平衡发展的需要 11
- 1.3 中国的贡献 15

II 成熟的诸方面

- 2.1 个人的成熟 27
- 2.2 社会的成熟 31
- 2.3 信仰体系的成熟 34
- 2.4 与权威的关系的成熟 49
- 2.5 社团生活的成熟 52
- 2.6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成熟 57
- 2.7 文化的成熟 61
- 2.8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成熟 69
- 2.9 决策制定的成熟 71

III 附录 75

IV 结束语 83

人类的成熟

1.1 一个全球性的过程

在人类成熟的图表（见图 1）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各大文明如同道道河川，汇聚于同一海洋。它们相对隔绝地流淌了数世纪，历经一个创建国家时期，之后便是近年来的飞速全球化。各文明交汇合流的同时，人类登上了社会演进的阶梯。社会单位已从家庭，演进到部落、城邦、国家，最后则暗示着列国一家。

在各种地域文明的影响下，社会发展的这些阶段展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从家庭、城邦发展到国家的每一步，都提高而非减损了个人的能力。前进的每一步，都为身处其中的个人扩大了机会，这些机会让人类精神得以表现，并将人类精神移植到越来越大的“园地”，直至我们达到了这一巅峰：觉悟到我们的一体性。现在，我们的视线第一次越过同一片水域而彼此相望，带着我们全部的集体经验和文化财富的广博遗产，以供相互探究利用。第一次，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融合为我们的世界。

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呢？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将文明指认为一个过程，一种进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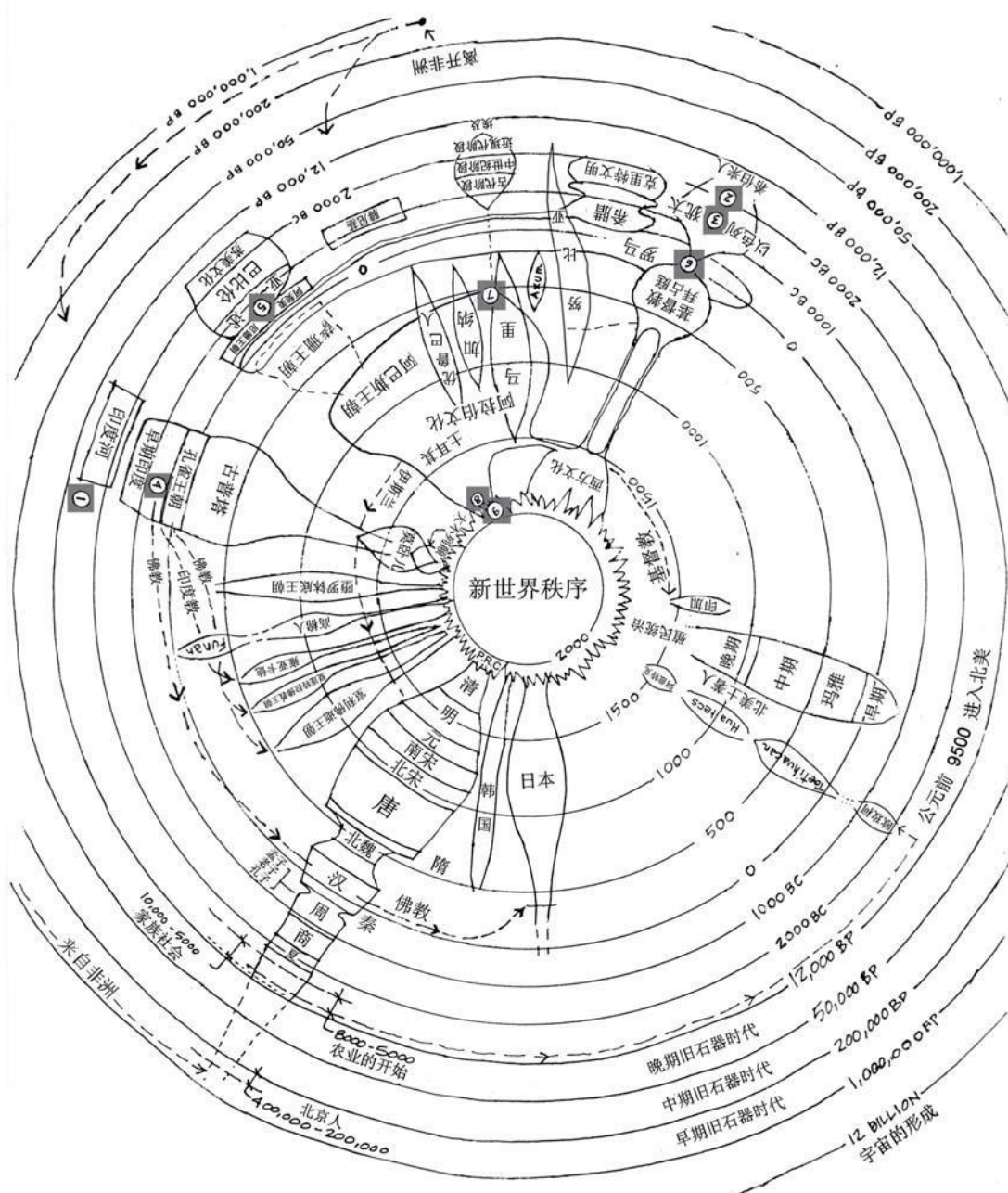


图 1. 人类的成熟图表。在 2000 年的光环大致代表着 254 个国家以及国家的独立日。数字代表各宗教的开始：1. 印度教 2. 塞宾教 3. 摩西 4. 释加牟尼 5. 琐罗亚斯德 6. 耶稣 7. 穆罕默德 8. 巴宇 9. 巴哈欧拉

.....来开创一种社会状态，可让人类全体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有如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的成员。我相信，这是迄今所有文明，即便不是自觉地，也是在无意中一直朝向的目标。^[1]

波斯的先知和作家阿博都·巴哈（1844-1921），把人类的成长过程比作个人的成熟过程。他说人类已走过了童年和青年的集体阶段，现在正进入期待已久的成熟阶段。每一阶段都划定了社会群体的边界，及合作互助的边界。而今这些边界已扩至整个星球。它们描绘出我们集体成熟的轨迹：我们社会的幼年、童年期，和当前从青春期的国家、宗教及种族对抗向成年期的过渡。我们现在必须获取“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能力”，以适应我们新的普遍状况——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

一切造物皆有其成熟的阶段或时期。一棵树的生命中的成熟期，是其结果之时。.....动物则是达到完全长大的阶段，而在人类王国中，当理智之光获得极致发展并达到最大能力时，人乃臻于成熟.....。类似地，人类的集体生活亦分阶段和时期。一时，它在经历童年阶段，一时经历青年时期，而今它已进入预示已久的成熟状态，其迹象处处可见.....。适用于人类历史早期之所需的，既不符合也不能满足今日这崭新而圆满的时期之要求。人类已从先前的局限状态和初步训练中破茧而出。现在，人必须拥有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人在青年阶段所拥有的能力和品格今天已不能满足其成熟期的需求了。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说，从进化的观点看，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正在迈向更高级的组织秩序，迈向一个全球社会，一个各国协同合作的“大型综合体”。并且，除了像美国、前苏联和中国，这些他称之为“综合体社会”的几个人口和疆土足够多的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发展到了足以独立自主的程度”。

虽然专门型的经济体制当中有几个，像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等等，设法为自身找到了能够赢利的小环境，但多数的

[1]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d one-volume edition, p.44.

专门型经济体制——即约有 120 个第三世界国家，既无大量贵重的自然资源储备，又未掌握发达的科技基础设施——发现自身的境况日益难以为继。

着手向下一阶段，一个超国界的社会演进，正是国家自身利益所在。^[1]

戈尔巴乔夫赞同此观点，他说：

在世界如此相互联系之时，还将国家利益摆在世界难题之上，实在是短视之举。^[2]

虽然中国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综合体”社会，并且其在全球觉醒的早期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剥削，其领导人仍然说：

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此说毫不为过。设立中央政府将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有了这样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就能得以维护。因此没有世界政府，当今的世界便没有秩序。（意译）^[3]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一直都在参与着集体成熟的过程；一个我们刚刚觉察到的过程。我们正在参与的有机过程中，一个复杂系统的各种元素极力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这一整体，各个部分就不能恰当地运作，甚至无法生存。我们正进入成长的必经阶段，一个全球化的动荡时期，社会、政治和精神成熟的前奏。我们可以把人类在文明及其相应信仰体系方面的数世纪的实验，看作是一个训练过程，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对人类品格的教化，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文明。

一个全球社会的创建，至少从贸易、交通和通讯方面来说，已然在我们眼前展现。

在这幸运的世纪中出现的科学技术进步，预示着地球上社

[1] Laszlo, Ervin, *The Grand Synthesis*, p.137-9.

[2] Gorbachev, *Associated Press*, Sat May 8, 9:31 PM E.T.

[3] Yan Xue Tong,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quoted in *China Daily* editorial, July 28, 1999.

会向前演进的澎湃大潮，并指出了人类的实际问题可能得以解决的手段。确实，科技进步恰好为大同世界的复杂生活提供了管理工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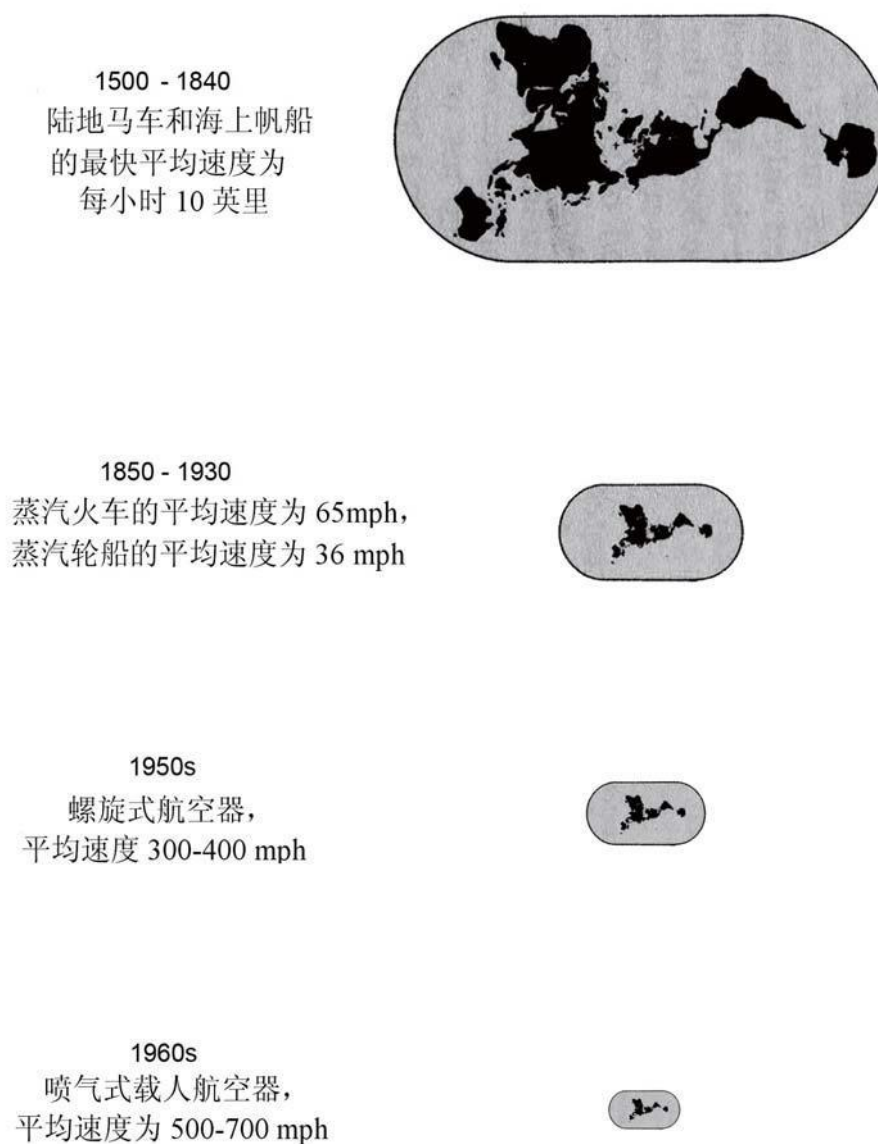


图 2a, 逐渐缩小的地界地图

[1]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Baha'i Studies Series No. 14, Canada, 1986.

广厦

图 2b. 缩小的地球

同样，还有政治和社会前沿的运动：

有利的迹象包括：初创于世纪伊始的国际联盟，与后来基础更为广泛的联合国组织，其迈向世界秩序的步伐日益稳健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纷纷独立，标志着建立国家的过程已告完成，这些初创国家可与老牌国家一道参与共同关切的事务；随后，以往相互隔离敌对的人民和群体，在科学、教育、法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的国际合作大量增多；近几十年来涌现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数目空前；呼吁结束战争的妇女和青年运动普遍展开；普罗大众谋求借助个人通讯来理解事物，而自然产生了不断拓宽的网络。^[1]

世界和平在过去十年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这一理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展现出来。长久以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已在人类进步之途上瓦解；看似无法调解的冲突也开始屈服于磋商决议的过程；以统一的国际行动来回击武装侵略的意愿正在萌生。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广大民众和世间许多领袖对我们星球之未来的一度几近泯灭的希望。^[2]

除非建立起这一全球社会，至少是达成政治上的停战，否则致力于国际、国内和城市的发展问题，就像是发了洪灾却只管救助溺水者，而不修筑堤坝。既然我们现在已是一副躯体，真正的国家自治唯有在各个器官和平联结、协同运作之后方能实现。

今日，人类已进入其集体的成年期，赋有能力将其发展的全貌视为一个单一的过程。成熟的挑战在于要承认我们是一个民族，要摆脱我们过去受局限的身份和信条，共同建立全球文明的基础。

确立一个既是进步的又是安宁的，既是动态的又是和谐的社会体制，它给予个人施展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自由，但乃是基于合作互惠。^[3]

[1] Ibid, Introduction.

[2]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1995, p.1.

[3]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introduction,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October 1985.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冲突格局积重难返的当今世界，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协调合作主导大局的世界。世界秩序的奠定，只能基于对人类一体的不可动摇的认识——这一精神真理得到了人类所有科学的确认。^[1]

我们亦可推想，这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所预言的和平年代的开端。它或许也是中国诗人和贤哲曾梦想的大同时代的早期。

“于大同世界，举世趋大同。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再无战争……。

“众生平等，无荣于地位阶衔。唯倡智与仁。智以举事成业，兴利助民，而仁以广济众生，普度万民，爱人利物。

“……于太平世，人之本性既善，才智既优，则惟以智仁之事为乐。机构日新。公利日增。心智日强。知识日明。举世之民并进仁、寿、极乐、至善与智慧之境。”（意译）

“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1] Ibid, Part 3.

1.2 内在与外在平衡发展的需要

就在当今时代似乎正要提供技术和制度手段来创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之时，腐败、自私和贪婪、国家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却严重阻碍了其进程。正当全球化培植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前景之际，恃强凌弱之加剧又见端倪。

我们有理由发问：“世界是否会被强权国家或企业操控而进一步加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我们的文化资产，我们对新世界秩序的潜在贡献，是否会被西方喧嚣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所扼杀？”“战争的周而复始能否终止？”“在环境破坏封杀了发展的可能之前，我们能否醒悟过来？”“我们真的是处在新纪元的黎明，还是全球灾难的边缘？”

无论前景如何完美，目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激发人们对前进过程的信心。产生这些疑问也就自然不过了：全球化究竟是要在保持多样化的前提下统一人类，抑或纯粹是要推动消费主义文化普及全球？它是给大众带来繁荣的体系，抑或仅是持有特权的少数人其经济利益的表达？它将导致一个公正秩序的

莫立，还是现存权力结构的巩固？^[1]

阴暗面的存在，表明我们仍欠缺成熟的行为和原则，以及与我们新的“地球村”状况相应的成熟机制。世界的不平衡，显示出我们“内在的”精神发展，并未跟上我们“外在的”物质发展。

不组成群体来相互支撑，人就无法生存。和动物不同，人不能孤立地生存。没有相应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合作与互惠，就没有可能达到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合作互助是社团的基本运作原则与社会生活的粘合剂：合作互助表现得越多，内在与外在生活的品质就越高。

合乎道德的知识与行为，给物质的发展标定了方向，并加以强化和保护。道德观是富于效力的；精神品质部分地构成了执行革新项目的能力，而精神视野支撑着实施项目的意志。发展的物质经纱与精神纬纱纵横交织。单以物质福利为目标的发展所带来的繁荣会更加捉摸不定，而非相反。人类是相当复杂的。回避人的精神能力，只把人看作是物质世界中的消费者，就大大局限了发展策略，阻塞了更深刻、更丰富、最终也更富能效的动力源泉。成熟意味着我们拥有潜在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并必须加以开发利用。阻滞该能力的发展，会进一步导致不稳定。

我们知道，社会的前进肇发于那些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有赖于发展品质和态度以助长建设性的人际互动形态，亦等量地取决于技术能力的获得。真正的繁荣——建立在和平、合作、利他、自尊、正直操行和正义之上的福祉——来源于灵性觉悟与美德之光，以及物质发现和进步。

这些品质，诸如可信赖、怜悯、克制、忠实、慷慨、谦卑、勇气和舍己奉公，为社团生活的进步构成了无形但却是根本的基础。^[2]

比较一些强制性的惩罚，威吓或腐败举报热线之类的措施，提高自我节制的能力对社会发展肯定是一种更长远的基

[1] Dr. Farzam Arbab, *The Lab,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 Edited by Sharon Harper, IDRC, Canada, 2000, pp.1-2.

[2] *Overcoming Corruption and Safeguarding Integrity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 Bahá'í Perspective*, Global Forum on Fighting Corruption II, May 2001, the Hague, Netherlands.

础。这种能力的保持和发展会带来精神与物质的同时增强。

除非个体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和渴望得到承认，否则发展的努力大多仍将归于失败。人类的幸福、安全和舒适，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正义，并非只是物质成功的副产品。相反，它们是从物质及社会需求的满足，与个体的精神满足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浮现出来的。

例如，美国的一群社会学家论说其国家的社会健康，因缺乏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而受损：

没有社会效益的工作，放在任何大的社会或道德背景中，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且必然产生疏离感，金钱报酬对此仅有几分安抚。造成疏离感的结果就是工作丧失意义，没完没了的竞争，自我中心的生活，家庭生活的气质与残酷竞争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分裂，以及注重功利的既无个人意义也无公民美德的教育。^[1]

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并非现代化的目标，它们是帮助我们在共同生存的新层次上达到内在和外成熟的手段。

除非个体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和渴望得到承认，否则发展的努力大多仍将归于失败。人类的幸福、安全和福祉，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正义，并非只是物质成功的副产品。相反，它们是从物质及社会需求的满足，与个体的精神满足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浮现出来的。

这空前的经济危机，连同其所催化的社会崩溃，反映出人性的概念本身存在着深刻的谬误。因为主流体制的鼓励机制，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响应，而且基本与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不接轨。我们看到，除非为社会的发展找到一种远远超越单纯物质条件改善的意义，否则就连物质改善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这种意义必须在生命和动力的精神维度中找寻，且须超越变化无常的经济景象，以及‘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的人为分野。^[2]

[1] Bellah, Robert,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85, p. 288.

[2]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Introduction, 1995.

中国的贤哲也认同，若无正直和正义的滋养，精神活力——气将馁败。并且，获滋养之气可弥满内外世界之间、“天地”之间的差距。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1921-22 年间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对于良好品格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关系，亦有类似的强调。

……我们对世上可以促成人类进步的力量加以检视便会发现，现代文明极其有赖于教育和科学：协同行动的能力取决于平等的原则与服务的精神；在政治、财务与行业关系中谐调合作的才能必然基于诚实无私之美德……。故理所当然，任谁无知，无能合作，不愿无私服务，同时又喜好压迫良弱，而畏伏于强恶以谋一己私利，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人类进步前行时退却落后。（意译）^[1]

若把阴暗面视为我们向集体成熟过渡之动荡期的一部分，并非是我们固有本性的表达，而是我们尚欠成熟的成长阶段的体现，我们对全球化过程的信心就会增加。

在过去浩瀚的历史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曾是不成熟阶段的表现，而人类今日所经历的无可避免的骚动，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集体的成年——坦率承认这一点，不应成为绝望的理由，而应该是承担建设和平世界这一恢弘大业的先决条件。^[2]

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深入，我们就会乐于找寻我们集体成年期所需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

[1] Cao Yun Xiang, Head of Qinghua University, excerpt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aha'u'llah and the New Era.

[2]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Baha'i Study Series No.14, pp.-4.

1.3 中国对人类成熟的贡献

人类正面临着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的巨大工程。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为了促进全球繁荣的发展范例”，而那需要“考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特征，来应对这个地球上人民和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相互联系”。^[1]

中国的贡献会是什么呢？

1990 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 (John Fairbank) 在他的新书《中国：新的历史》的导言中，称中国为现代性的后来者。他还问道：

中国从隔绝状态中浮现出来，只是及时地参与世界的终结，还是偕其数千载的生存经验以援救世界？

1923 年，作家兼国际事务观察家守基·阿芬迪说：

中国，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世界与文明，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1923 年），其在物质、文化、精神资源与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其未来无疑是光明的。^[2]

1921 年，伯特兰·罗素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时，评论中国道：“生产而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ward a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21st Century, August, 1994.

[2] Letter from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a'is of the East, 23 January 1923.

不占有，行动而不独断，发展而不主宰。”^[1]

1917 年，阿博杜·巴哈（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儿子）说：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能。中国人极好追求真理且纯真无邪。……真的我说，中国人免除了任何欺诈伪善，可为理想的动机所激励。中国是未来的国家。^[2]

这些对中国寄予高度期望的说法并没有聚焦在中国的商务能力或辛勤工作的能力上，也没有强调中国在 14 世纪前科学技术成就领先于世界文明的辉煌时代。相反，他们主要提及中国的品质，她的社会和精神能量与潜力。这就是中国的潜在贡献吗？

……在过去的四十个世纪里，中国在生活之道上必定汲取了许多教训，其思想必定已臻成熟。或许中国要有所贡献。比起相互杀伐，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更人道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争端。肯定的，有着四亿民众（1930 年）、四千年文化和广阔的资源，中国必将对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有所贡献。^[3]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精神 - 哲学遗产做一个简要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精神教育有道家、儒家和佛家的印记。例如，中国由道家衍生出融合正反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更多地看到系统整体而非二元分立的能力；借儒家精习了如何把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从佛教获取了高洁的灵性，及对物质和灵性之间契合度的敏锐感知。

我们在中国会发现：

- 诗人和贤哲之言所表达的对正义的热爱；^[4]
- 对和谐、互惠和对立统一的信念；
- “信仰体系是社会秩序的根基”这一悠久的儒家观念；

[1] Russell, Bertrand, *The Basic Writings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1903-1959*, Edited by Robert E. Egner and Lester E. Denm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1.

[2] Abdu'l-Baha, Repor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8, April 28, 1917, No.3, p.37.

[3] James Yen, *Intellectual Shock of China*, *Star of the West*, 19,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SW October 1925, 16:7.

[4] 汉语的“城市”字面意为“有墙的集市”。“市”的字形首先是在金文中由“平”字演化而来的，意为“平等”。其早先的意思，当然就是人们聚在一起进行“公平”的物品交易的地方。”

- “天下一家”的信念；
- 对完美的热爱，产生了诸多世纪的瑰丽文明；
- 好谋求共识而非借助诉讼来解决冲突；
- 服从的能力；思想开明而少偏见；
- 希望“从事实中找到真理”；
- 喜爱实际地运用知识；钦慕行为而非言词
- 注重家庭关系，尤其是孝敬父母。

下文摘自广为人知的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它是孔子教义的“概要”。千百年来，学童都会背诵它，其主旨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中。简言之，它主张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昭明美德；其方法包括规范，培养，纠正和调查；此过程将国家内政生活与实现和平发展，将社会福祉与个人精神健康联系了起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人对真理实情的调查（格物）乃是内在与外在的平衡所依靠的支点。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1] 比如，在 1997 年，在北京鼓楼附近的黑芝麻胡同小学，我儿子的家长会上，老师在谈到教育目的的问题时，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怕笨，我怕坏。”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至少部分地可以追溯到大乘佛教的教义：

.....普度乃基于众生本为一体之念。.....个人可净化自己，从而逃离罪业之苦，然只要还有人尚未觉知全体的灵性交流，则任何人的救度皆非尽善。.....度人以度己乃佛教所教诲的普世之爱的训示。^[1]

如果我们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支持的话，我们将发现中国提倡的和谐、关系的重要、平衡、中庸、以及集体重于个人的信念等等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与无限制的扩张、对欲望的满足、获取、消费主义以及个人重于集体等相比，这些不是更吸引人吗？中国艺术的美、她大多数的诗歌、特别是她的园林设计，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与和谐的诸多考虑之一。

迅速审视了中国的社会——哲学——精神遗产后，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对中国的“资源”与“潜力”的评价。我们在中国的精神基因库里发现了很多活跃和潜藏的因素，都与人类进展到其综合成人期相关。

中国人第一个就会承认他们并没有总是遵循他们的价值观和教诲。他们指出历史上的暴乱。他们也会指出中国当下的问题，如腐败、社会问题、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

当我们去看中国历史上的暴乱时，我们应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几千年前开始的伟大文明在唐宋时期臻于成熟，随后是长期的没落，直至 1911 年止于末代皇帝。暴乱标志着每一个朝代的兴替，两次领土扩张时期，以及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稳定增长期与分裂混战期交替对比。我们需要注意主要的征服与扩张期发生在元朝与清朝，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汉族而是异族。蒙古人（元朝 1268-1368 年）和满族人（清朝 1644-1912 年）均来自北方，他们分别占领中国，执掌中国航船之舵。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中

[1] E. A. Burt, *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 A Mentor Book. 1955, p.124.

国不曾参与全球殖民统治，但曾受到他国的殖民统治。

尽管战乱频仍，中国在最长的历史时间养活了最多的人口。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不时出现的战乱期视为文明建设之漫漫长路上的困难——或者说是在当时缺少更恰当的方式或方向，而不应将它们视为中国天生的性格。

同样的，中国当前所遭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逐渐增强的“财富不能带来快乐”的不安，都表明了它与其道德标准间的矛盾以及与其精神根源的距离。这种不安同时表明了中国心理上的价值系统的活跃程度，仍像飞轮一样在不停地转动。中国古代极受欢迎的诗人杜甫的声音仍在回响：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
惆怅难再述。^[1]

如果我们将这些缺点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尚不成熟的阶段的标志”，那么极有可能的是，尽管中国的精神遗产目前看来极为贫弱或受到了强大的威胁，它并没有失落。能认识到这些缺点就已经是成熟的标志之一。

对物质与精神必须携手发展的认识是通过一个世纪的疑问、探索、实验以及汲取教训中不断增长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贫穷和物质匮乏的时代，首要的任务是集中精力改善中国的物质条件，传统的和革命的美德，诸如克己、适度、为人民服务、中庸、服从等等很少

有冲突。中国在“废除长期的不公正和独裁统治方面，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解除极度贫困方面，以及扫除基于迷信基础上的根源极深的信仰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

这个进程包括在那场狂热的青春期自我毁灭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精神遗产的灭绝，那是一场旨在消灭“四旧”（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和旧文化）的运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从这种近乎“文化自

[1] Du Fu quoted in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Robert Payne, Mentor Books, 1960, p. 183.

[2] *Thoughts on China*, 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 May 19, 1989.

杀”的状态进入了“一个试图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新的关系的实验和改革的进程”。^[1]与自身传统的关系逐渐成熟，能够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眼光去翻检这一巨大的遗产。对一切传统的东西过去只是不加分析地一律排斥之，现在的态度渐渐成熟了，能够从中找到未来繁荣和发展的资源。

1978 年是一个分水岭，门户开放政策既鼓励了外国人又激发了本国人的个人主动性，来参与国家（首先是经济和科学）的重建。中国现在正不断力争现代化以“赶上西方”，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变迁或“改革”。中国对其现代身份的探究，并未循行偏狭的民族主义道路；相反，中国自由地尝试非中国式的科学、技术、商业方法、法律等等。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封闭到有意识地与外部世界恢复往来。中国正经历“改革”和现代化的挣扎，以“追上西方”。中国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改革开放，发展成为亚洲新兴的经济力量。短短的 30 年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世界也随之体验了她的改革开放，并且为它的发展而投资。

今日的中国摒弃了数世纪以来传统的对科学漠视的态度，而给予科学崇高的地位。^[2]科学和高科技现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表征和主要方案。中国近来增加了对研究的投资，正摩拳擦掌要成为科学领域中的世界领袖。

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她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中国有意识地奋力前行了一百年。中国没有自满，也没有松懈麻痹。进入 WTO，成功申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均有助于再度唤起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乐观精神。

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成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阴影。腐败、社会和环境问题持续不断，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标志越来越明显。腐败在一个将领导工作与道德水准相联系的文化背景中更显突出。与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相比，对腐败的容忍可能是对稳定更大的威胁。

现在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富裕，对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能够接

[1] ibid

[2]“有两千年，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其令人注目。之后从两三百年前开始衰落了。约瑟夫·尼达姆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前言中，评论古代中国人的科技发现和发明时写道，他们‘常常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到了 15 世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汇编《古代中国的技术与科学》，外文出版社，1983 年，第 1 页。

受，人们不知道除了过舒适的生活外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不同的价值观互相矛盾地混在一起。中国传统中平衡个人和集体权利的习惯导致了中国人对现代社会里为追求物质财富而追求财富的倾向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警惕。人们逐渐认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快乐，认识到缺少“社会生态”和物质与精神的一致性。中国亲身体会到，物质的高度丰富、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不是最终极的目的，也不能确保“和谐社会”。

在向西方开放的近些年来，中国的精神资源被西方世界消费导向的物质主义发展模式所遮蔽的现象日益严峻。中国越是接受去掉了我们精神能力的发展的“现代化”的定义，就越不能看清自己潜在的精神贡献的价值。她对自身卓越理念的鉴识，不仅因为强调物质发展而被抑制，而且因她自谦的本性而被延缓。“的确，我们国家落后”，很多中国人会点头称是，却加强了西方的自我优越感。

科学的进步，尽管导致了物质的发展，却需要与道德进行对话，以公正地、恰当地发挥它的利益与能力。科学技术既可以施展于和平用途，而在腐败的人或者冷酷的或者不明智的人手里也可以应用于破坏性的目的。例如，全人类所痛心疾首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等的过度储备，显然是对科学的误用。而在虽不致命，但其危害性更为隐秘模糊的前沿领域我们遭遇到新时代的电脑盗窃和恶意病毒。

1939 年，外国人士朱丽叶·布莱登 (Juliet Bredon) 说道：

虽然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尤可钦佩并引人注目，但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未来的一大问题，是要让新的标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过渡时期常常带来错误和仓促的现代化冒险，而令一切都丧失了个性。在陈旧和崭新的两极之间，钟摆来回往复。要加快运动又不扰乱平衡，是有思想的中国人已开始着手的一项艰难而精巧的任务，他们确信无疑：要么道德伦理和（科学）知识并驾齐驱，要么丧失一切。^[1]

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阴影是对精神质量的一个警示，提醒人们需要平衡内在和外在的发展。它们是一个信号。现在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已经到了将注意力返回到根源的时候了，即“修身”，以改善道德价值和行为。

[1] Juliet Bredon, Peking, pp.54-5, 1931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都极其明了失去稳定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已获得了有意识地谋划透过苦难和成功未来的能力。苦难自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它首先是一种能力的资源。中国典籍中高度评价这一过程，如在易经中，还有孟子的描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

而近些年来缺少物质、精神间的平衡所带来的痛苦与尴尬将挑战中国对更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索。

但是如果将我们时代的真正需求与中国传统里的精萃成果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承载的许多品质、技巧、态度和能力，正是挣扎着迈向成熟时期并抛掉“积重难返的冲突格局”的世界所需要的。发现中国浩繁广博的文化、哲学和精神遗产与新时代的需求多有合拍之处，发现中国能为人类“真正的”现代化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会是一个确认，一份欢欣，振奋着中国人的心灵。也许，如费正清所推论的那样，中国的天命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实现物质与精神间更有活力的平衡，而且还要与世界分享其经验。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其他国家，它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范例及其促进世界和平的协同努力，而在新世界文明的发展中，成为更具效力的参与者。中国不需循行他国踩过的旧径；它可以开辟一条新路，直接迈向新世界秩序中一个赋有尊荣的位置，而中国将亲身协助该秩序的建设。^[2]

[1] Mencius, Legge, bk.6, pt.2, ch.15, art.2

[2] Thoughts on China, 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 May 19, 1989.

成熟的诸方面

怎样自然而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及社会成员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现今的观念反映了人类在其发展的早期和尚欠成熟的阶段中所达到的理解水平。如果人类真地在走向成熟，如果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如果正义要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那么，由于对日渐显露的这些事实的无知而产生的现有观念，就必须加以重构^[1]

我尝试着从以下方面来描述我们的集体成熟：

- 2.1 个人的成熟
- 2.2 社会的成熟
- 2.3 信仰体系的成熟
- 2.4 与权威的关系的成熟
- 2.5 社团生活的成熟
- 2.6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成熟
- 2.7 文化的成熟
- 2.8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成熟
- 2.9 决策制定的成熟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Part 3.

2.1 个人的成熟

个人品质作为基本的发展目标其所赋有的重要性都蕴含在中国的文化里。例如：

儒家学说将治国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修身……。它把平天下这一最终目的，和修身这一必然起点，逻辑地联系起来。（意译）^[1]

新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 年），希望合乎天理的统治应注重“全民的自我修养”。他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和良政的基础。^[2]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

[1]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Edited by Lin Yu Tang,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8, p. 22.

[2] 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London, 1992, p.124.

在中国，“人的素质”这一说法时常在讨论中出现。缺乏素质往往被归结为问题的根源和发展的障碍。

“自然而和谐”是宇宙的根本特性，亦是人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裙带关系、自私自利、国家冲突、家庭内部和男女之间的摩擦、宗教间的隔阂，都在人类和谐、进步与团结之道上作梗。因而，要消弭争论，抛却好恶而改进人品就势在必行了。

但这一目的不能靠惩罚来实现，因为惩罚只能矫正外部的，却不能疗治心里的。此即儒家学派思想何以主张，要让民众行止端正、品性高尚，教育乃是关键而有效的途径，因为人性之本质是与天道相合的。^[1]

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之道是和谐的，人之道亦是如此。人性的基本表现应是和平宁静的，并与自然（宇宙）秩序合一。那些好挑起争端的人既偏离了人道也背离了天道。教育的责任和功能在于改造和匡正那些离失了人道的人，先匡正其心，再使其行止合乎规则，从而达至社会的和谐。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作为改进品性的手段，教育占有重要地位。^[2]

用类似的语汇，阿博都巴哈描述了个人的灵性化，个人的精神成熟可作为矫正犯罪的方法，及社会和谐的基础。

精神文明会训练每位社会成员，除了可以忽略的少数外，无人会从事犯罪行为。人们会把犯罪看成是奇耻大辱，把罪行本身视为最严厉的惩罚。^[3]

之所以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乃是根据这一假设：人是可以教化的；人有别于动物，是“天”的反映，有组织社团的才智，生来就有爱与正义的能力。

[1] Sun Li Bo, Unpublished paper, 1998.

[2] Sun Li Bo, Unpublished paper, 1998.

[3] Abdu'l-Baha,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a, p.133.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篇第九》）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第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章句上》）

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还须基于这一假设：人究其本性，并非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略性。这后一种行为，其产生乃是后天学得的，而非先天所固有。

侵犯与冲突成了我们社会、经济和宗教体系的显著特征，以致许多人已屈从于这一观点：此类行为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因而无法根除。

这种观点一扎根，令人束手的矛盾便在人类事务中滋生出来。一方面，各国人民都宣称，自己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和平与和谐的到来，渴望结束终日缠身的惶恐忧虑。另一方面又不加鉴别地认同这一主张：人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略性，因而无能建立一个既和平、和谐，又是进步而动态的社会体系，一个既允许个人自由施展创造性和主动性，而又基于合作与互惠的体系。

对和平的要求日益迫切，这一基本矛盾却阻碍其实现。那么，关于人类古代境遇的通常看法所基于的那些假设，便需重新加以评估。经过冷静检视便可证明，此种举动远非人类真性的表达，而是人精神扭曲的反映。确信这一点，全人类就能开动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符合人性，因而会鼓励以和谐与合作来取代战争与冲突。选择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要否定人类的过去，而是要去理解它。^[1]

不论是政府的对抗体制，渗透于多数民法的辩护原则，对各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斗争的颂扬赞美，还是主导了大部

[1]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5

分现代生活的竞争精神——冲突以各种形式被公认为人际互动的主要推动力。它还在物质主义人生观的社会组织中另有一番表现——两个世纪以来，这种人生观日益得到强化。^[1]

尤为特别的是，对物质追求的美化——它既是所有这些观念形态的起源，同时又是其共同特征——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人的自私和侵略性无可救药”这一谬论滋长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必须为建设一个适合我们子孙后代的新世界清理场地。^[2]

孟子也赞同，人的本性并非是恶的。他把人的精神比作山上的树，山被附近乡民垦伐，被牲畜侵蚀。他问，山貌退化是否归因于山的本性？他宣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章句上八》）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七》）

千年来中国一直明白，对个人的道德教育和训练是发展的基础。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国奋力建设一个全球共同体时，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2]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5.

2.2 社会的成熟

加拿大心理学家侯赛因·丹尼什 (Husayn Danesh) 博士把迈向成熟的转变，描述为从专制型和放纵型转向更成熟的“整合型”社会关系的一个运动过程。

虽然专制型的关系曾经并仍然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不过还有放纵型和整合型两种。……人类成熟时代的莅临，必定与整合型的生活、人际关系的优势相契合。专制型和放纵型展示出童年和青春期发育阶段的特征，而整合型则描绘了一个成熟类型的人际关系，因而，它对于我们理解推动人类由青春期间向成年期过渡所需的先决条件来说尤为重要。^[1]

他把这些关系模式演绎为性格类型（见下表）。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类型看作是范围更大的社会状态。

[1] H.B. Danesh, M.D., *Unity: the Creative Foundation of Peace*, Baha'i Studies Publications, Canada, 1986.

人格类型 (民族性格)	特征	世界观	情感与理智特征	与他人的关系
专制型	以权力为导向	二元分立的感知	刻板僵化	屈从于专制
放纵型	以享乐为导向	不加分辨的感知	混乱	无法无天的关系
整合型	以成长为导向	存多样求团结	有创造性	负责与合作

图 3：人格与社会类型

如果我们把上表放在中国，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从专制型向整合状态成长。据此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专制主义不是永久性的状态，而是成长的一个阶段。

中国围绕君权天授的帝王而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展示出了克制和中庸，对“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这一原则的尊重，以及服从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整体福祉的重要性。比如，它提倡当个人与社会或家庭发生冲突时，个人应放弃自己的利益，即舍身取义。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克制和中庸、注重群体理解为尊重整体团结或是尊重领导制度，而只是从服从专制“政权”的角度来解释。

更成熟的整合模式的世界观是“存多样、求团结”。现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已是所有社会不论是专制型还是放纵型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如果我们认同个人可得益于社会整体的组织，那么理所当然的，个人行为要是能加强整体也必定会加强个人。没有这个基本理念，就不会有动力去参与到集体的命运中，或是去服务他人；合作互惠的原则亦难以实行。

虽然人类社会并非纯粹由一堆互不相同的细胞所组成，而是由个个都赋有理智和意志的个人联合而成；但是突显出人的生物学特性的运作模式，也生动地表明了生存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中最首要的就是存多样以求团结。看似矛盾的是，正是人体组织秩序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以及身体细胞在身体中的完美融合——才允许了身体的各个组成部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独特能力。不论是在为身体的功能出力，还是从整体的安

康中摄取养分，任何细胞的存活都不能离开身体。^[1]

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的同时，个人的修身，正像儒家模式所阐述的，仍然是发展的出发点——“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当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其个性并不会在群体中消失，而是在发展中更被关注，从而在前进的潮流中发现自身的位置；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得益于个体成员所积聚的天资和才能。这样的个人不单纯是通过满足其自身的要求，而是通过实现其与人类发展目标的完全合一，来将其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这种关系对于文明生活的保持极其重要，它要求社会与个人之间极尽理解与合作；因为需要培养一种风尚以便社会个体成员的所有的潜力得到发展，这种关系必须允许“个性”有“自由空间”，通过自发、主动和多样的形式来确保社会的生命力，从而“维护个性”。^[2]

公民权，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同时满足两个目的：分享和表达我们独立的、个人的能力和智慧；以及确保整个社会的活力。尽力创造出后者，才能更好地开发前者。

中国要进行这一过渡，也许比西方社会从较为“放纵”的状态转向成熟更为容易。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p.4.

[2] Letter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3 信仰体系的成熟

各信仰体系：同一过程的各个要素

我们一览人类成熟的图表（图 1），便会观察到以下模式：

- 文明的“河流”
- 这些河流汇入同一海洋
- 各大文明都和某一信仰体系紧密相关

每个文明周期都能追溯到某个强有力的、催发灵性的影响，究其根源，便是其创始人。事实上，诸如印度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这些文明的称呼和信仰体系的称呼，甚至其创始人的名号，大多是可以互换的。与各文明相关联的创始人包括：克利什那和古普塔文明，摩西和犹太王国，琐罗亚斯德和波斯帝国，佛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影响，耶稣和拜占庭帝国，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于 1500 年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复兴，当归功于伊斯兰的影响。

与这些伟大文明的成熟时期相关联的，有所罗门、阿育王、康斯坦丁、萨拉丁和阿克巴等伟大的君王。中国早期的一位圣王也许是一个文明的创始人。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但却在中国扎了根。孔子和老子从

未声称自己是先知，但他们的教义被拥奉为中国内在生命的根本哲学基础。

本文的附录《文明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列举了若干简例，来说明灵性推动力总有“文明”响应紧随其后的现象，特别是源于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文明响应。

各个信仰体系都有一位创始人和一本经书。信仰体系的创始人推进爱与团结的大业，并给出关于其所在时代的律法和社会原则（详见附录）。如果我们认同道德思想大多来源于各大信仰体系，如果我们认同互助互惠是文明的根本，我们就可以论证，通过这些体系的影响，人类天生的道德与精神禀赋逐渐得到发展，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世界上的各个宗教提供了伦理秩序和精神根源，由此产生了社会秩序，并结出文明之果，整个进程都是由阳光 - 造物者的教化所推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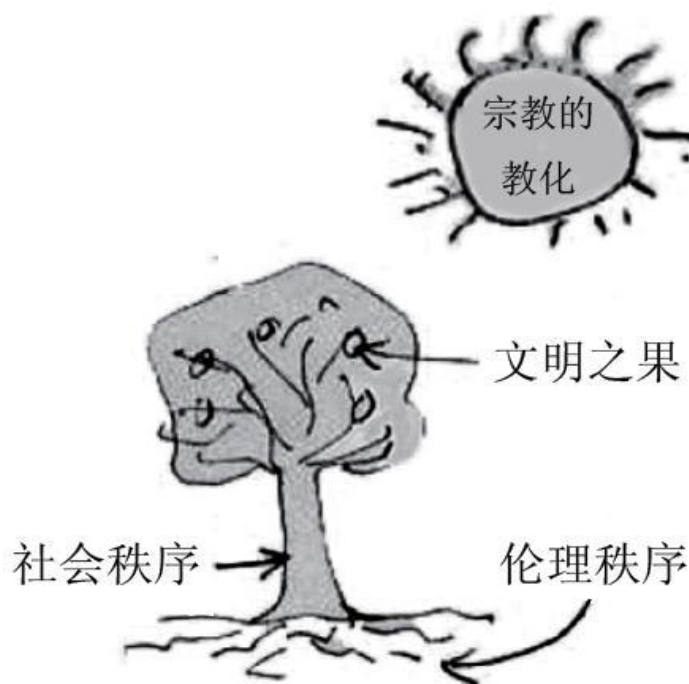


图 4. 文明的元素

只要和现世的生存有关，宗教最大的功绩，多在于品格的教化。通过其教义，并通过这些教义所启迪的人生楷模，历代

各地的芸芸大众都发展出了爱的能力。他们学会克制其本性中的动物层面，学会为共同的利益作出重大的牺牲，力行宽恕、慷慨和信赖，并将财富及其他资源供给文明进步之用。他们谋划出制度体系，从而将这些道德进步大规模地转化为社会生活规范。无论如何被教条增生所遮蔽，或被宗派冲突所扭曲，克利什那、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卓绝人物所启动的灵性推动力，都对人类品格的教化发挥了最主要的影响。^[1]

他（巴哈欧拉）说，神圣天启是文明的原动力。当天启出现，它对那些回应者的心智与灵魂的转变作用，便复制到新的社会中——这个新社会是围绕他们的经验慢慢形成的。一个人心所向的新的中心浮现出来，它能赢得各种文化背景的民众投效于它；音乐和艺术采用的象征符号，传达出益加丰富、更为成熟的灵感；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是非观，使得制定关于民法与操作的新法典成为可能；新的机制构想出来，而让前所未知或被忽视的道德责任之驱动力得以表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2]当新的文化演进为一种文明，它进行大量的更新转换来吸收过去时代的成就和洞见。过去的文化中不能被融合进来的特征就会萎缩，或被民众间的边缘份子所接续。上帝之言既在个人意识里也在人际关系中创造新的可能。^[3]

但是，每一个文明也都有她的寿命。文明过程的每一次显现，都展示了内在的有机循环周期，始为朝气蓬勃，继而成熟随后衰落。起初，其信仰体系是伦理行为的主要根源，为文明的幼年和童年期提供了道德基础。当一个信仰体系的生命力处于巅峰，激发出社会秩序、文化和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安定、繁荣、兴盛的文明便产生了。当宗教教化的澄明和动力减弱，当道德戒律的力量松弛了，文明就从内部溃散了。

中国不同朝代文明的兴盛和衰退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的成熟期。中国的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将不同历史时期形容为，充满活力的汉代，成熟优雅的唐宋和僵硬死板的明清。当信仰系统的创造力进入衰退期，其相应的文明体系的发展也停滞了。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Part 4., 1995.

[2]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atement on Baha'u'llah, May 29,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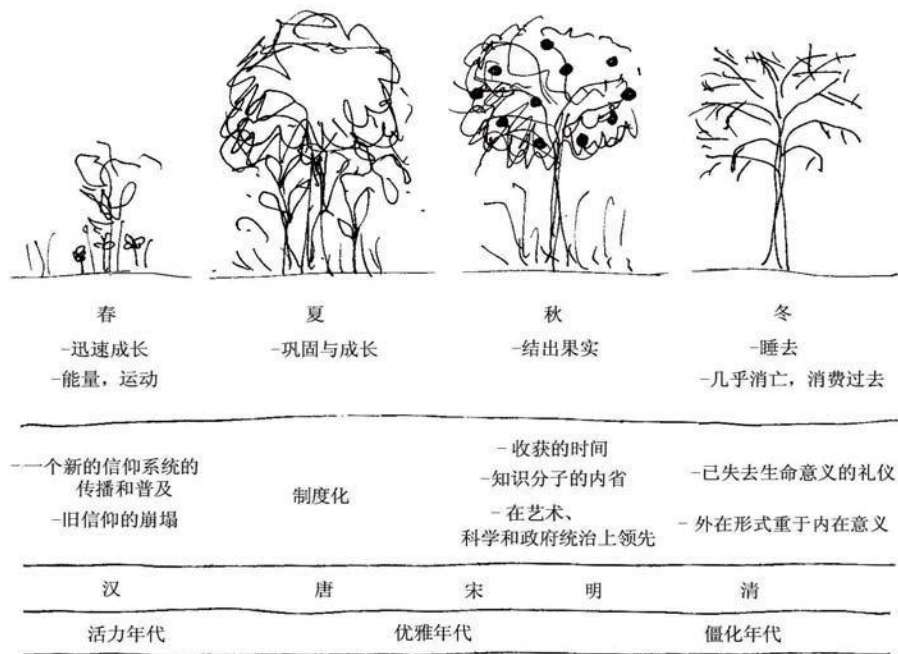


图 5. 一个文明的生命周期

如果我们将一个文明的发明创造和科技成就看作是文明生命循环过程中的必要产品，那么我们就能回答著名的“李氏问题”了。李约瑟 (1900-1990)，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主要作者，将其一生投入到发现“中国直至 15 世纪一直是地球上最领先的文明、奉献给人类数百个最为人知的发明”的工作中。

李约瑟想“探求 500 年前中国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使得现代科学的发展必需发生在别处，主要是地中海沿岸，而不是中国。现实情况是很明显的：在 15 世纪中叶，中国所有的科学进展基本都陡然停止，欧洲那时却担当起了发展世界文明的领导角色。为什么会是这样？”^[1] 什么中国不能保持她的早期优势和创造优势？”“为什么中国人停止了尝试？”^[2]

十五世纪中期正好与中国由佛教衰退开始引起文明创造力走下坡路是重叠的。很自然的是，当这一循环要结束的时候，其在科学发明进步方面也开始衰退。

[1] Simon Winchester,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HarperCollins, New York, 2008, p.190.
[2] Simon Winchester,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HarperCollins, New York, 2008, p.260.

感谢李约瑟，他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他的研究，中国的发明与科学概念是欧洲农业进化的基础。而农业进化是工业进化的基础，而这些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科学上的领导地位下降与其长期的文明生命的终结相一致，其文明生命在几千年前由宗教所推动，最近的一次由佛教助力。随着这个信仰系统的创造力的亏蚀，它的果实也枯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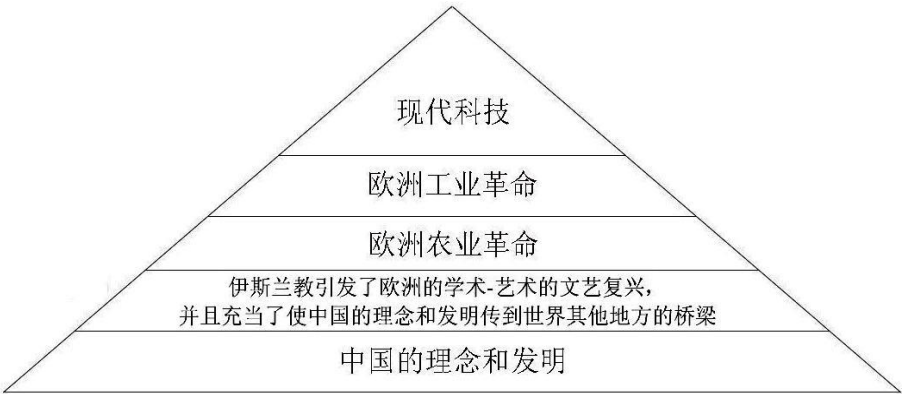


图 6. 科学技术的进化过程^[1]

在中国的生产力也开始走下坡路的同时，伊斯兰的最富创造力的时代也已终结。以穆罕默德开始的文明将其领导者的火炬传递给地中海南岸与欧洲，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欧洲还将沉睡在长达 1000 年的黑暗年代。

伊斯兰给欧洲带来的礼物包括来自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的文化知识。伊斯兰在将中国的科学及工程技术引入欧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发明和其在欧洲的应用之间的时间差超过 1000 年。

如果世界上的国家和人民相互间有更清晰地了解就更好了，就能在东西方之间的认知鸿沟上架起桥梁。总之他们是，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建造一个世界文明的紧密伙伴。今天的技术世界是一个东西方合作的产物，直至最近尚无人能想象得到它的发展程度。现在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认识并了解中国的贡献的时候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今天学校里的

[1] The diagram is based on evidence demonstrated in Robert Temple's book, The Genius of China.

孩子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这一代人将把这些知识吸收到他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里。当如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才能平等相看，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全面的伙伴。^[1]

贯穿历史，“信仰体系与文明”的过程在各个时期和地域里的相似性，不同信仰体系的伦理信条在本质上的和谐一致，以及我们由穴居先民向世界公民的晋升——都暗示着文明和信仰体系间的关系是一个持续进步、不断前行的过程。该过程的目的，如汤因比所提出的，是要

……来开创一种社会状态，可让人类全体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有如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的成员。我相信，这是迄今所有文明，即便不是自觉地，也是在无意中一直朝向的目标。^[2]

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单独的“宗教”，精神教育的过程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我们曾将其各种不同的面貌曲解为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所“大学”，以前是在分开的校区里，而今正进入同一个全球“校园”。当我们面向历史上各大信仰体系迄今所达到的地步，我们是在看旧课本，和我们童年与青春期的课堂行为。如果过去的各大信仰体系都是一个前行的、晋升的“内在”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则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该教育过程，而是要进行一番更新，要有一套与我们同一个星球的世界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课程。

[1]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1998, p.12

[2]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d one-volume edition, p.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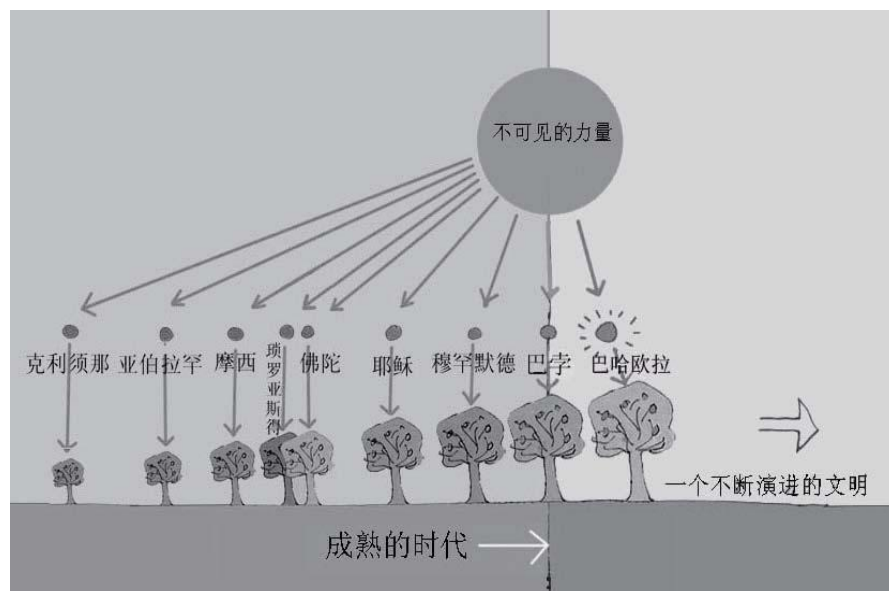


图 7. 同一精神教导的进程

列教皆有其在天之源而从之。溯其源，三圣无异也。（意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

既然视为一个过程，则任何信仰体系若主张唯我独尊，便毫无根据了。这样的主张并未看到所有体系共通的统合意向。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旧的信仰体系，一旦其生命力耗尽，便再也无法作为重建的基础。这就需要真理的再生，而不是复述真理，需要一轮新的春天，真实精神的一次复活。虽然从一个“（信仰）周期”到下一个周期，真理会再次回响，甚至是原原本本地重申，但真正的更生力量却已传递给了新出现的信仰体系。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整个事业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心智不断创造出更为复杂而有效的手段，来表达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和理智能力。……该现象是不不断再现的；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因为它是演进的秩序所固有的基本现象。^[1]

[1] Who is Writing the Future?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art 1, 1999.

纵然从该过程中得到滋养，人类却从未理解过它。相反，人们围绕着自己精神经验的每一段落，都分别构建了一个宗教体系。贯穿历史，宗教推动力一向因矛盾与苦痛冲突的结局，而屡受羁绊。

就如科学和法律总是趋向越来越精确地定义实体而时常被更新一样，宗教也必须获得更新。信仰体系的“生命之水”的效力，具有清洁净化的功能；但是，不断使用也是一个不断污染的过程。比如，刘子健 (James T. C. Liu) 推崇宋代新儒家为“道德先验论者”，但后来他说，“新传统主义完全渗透到文化中，以致它丧失了转化的力量。”

随着信仰体系的生命力减弱，它就逐渐不再管理人们的行动或对人们加以规范了。随着社会的成熟，信仰体系中的社会教义便失去了切实性。范围扩大的科学不再和宗教同声相和。信仰体系降格为外在的形式、外表和仪式，而缺乏内在的意义。它们和发展的新阶段毫不相干以致必须被抛弃。信仰周期这一必要的冬季，把墨守旧时代体系的社团同转向新灵感源泉的社团划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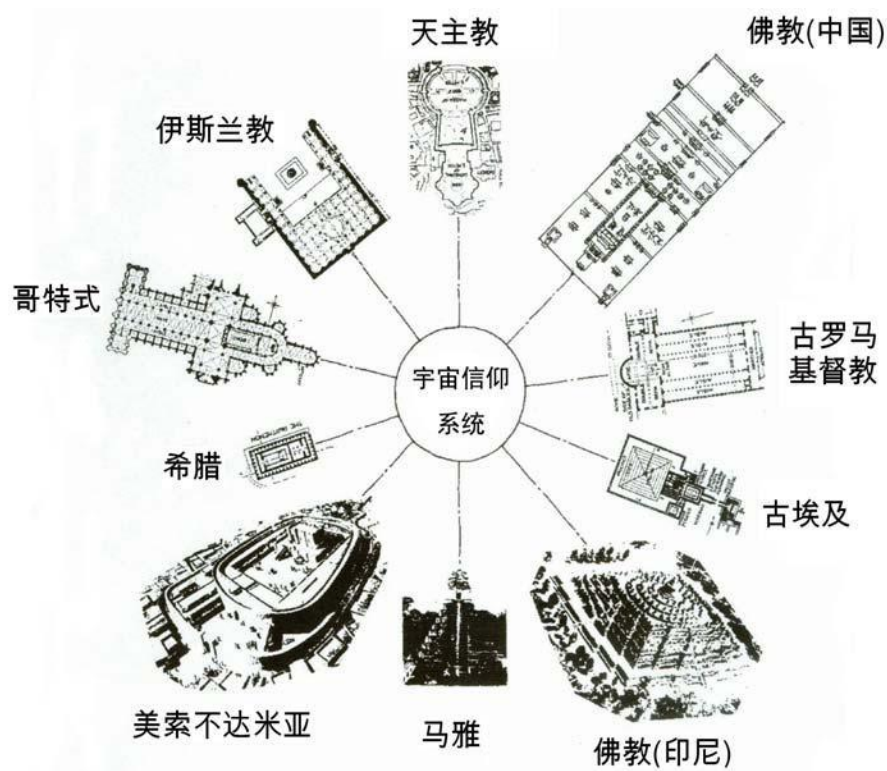


图 8. 人类信仰的汇合

就如科学和法律总是趋向越来越精确地定义实体而时常被更新一样，宗教也须更新。信仰体系的“生命之水”的效力，具有清洁净化的功能；但是，不断使用是一个不断污染的过程。比如，刘子健（James T. C. Liu）推崇宋代新儒家为“道德先验论者”，但后来他说，“新传统主义完全渗透到文化中，以致它丧失了转化的力量。”

随着信仰体系的生命力减弱，它就逐渐不再管理人们的行动或对人们加以规范了。随着社会的成熟，信仰体系中的社会教义便失去了切实性。范围扩大的科学不再和宗教同声相和。信仰体系降格为外在的形式，外表和仪式，而缺乏内在的意义。它们和发展的新阶段毫不搭调以致必须被抛弃。信仰周期这一必要的冬季，把墨守旧时代体系的社团同转向新灵感源泉的社团划分开。

宗教是神性实质的外在表达。因而，它必须是活的，富于

生机的，运动的，进步的。倘若它没有运动和进步，它就没有了神性的生命；它是死的。神性的法则是持续活动的和演进的，因而，对这些法则的启示必定是进步的和连续的。一切事物都受制于革新。^[1]

以前的信仰体系虽然跨越了国家和种族的边界，但未能成为世界性的。例如，佛教很合中国的口味，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罕能渗入汉人当中。那时人类尚不够成熟以接受世界性的体系，也无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然而，所有这些信仰体系，普世性已潜存其中，让我们为那备受期待的圆满的日子预先做好准备。

今天有许多人，对宗教的第一印象便是偏见、迷信、无理性的盲目服从、暴力甚至战争，都冠以宗教之名。倘若这些就是所谓的宗教的果实，那我们丢掉它岂不是更好？关于这些不无道理的印象其根源何在，以下所作的区分可提供一些解释：

1. 道德教义和社会教义之间的区别

虽然各体系的道德教义都基本相同，例如“爱你的邻人”这一主题贯穿了所有体系；但各体系中关于婚姻、遗产、饮食等等的社会教义则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然而，一个体系里数世纪的积习，使得放弃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迈向新一级的社会律法原则并非易事。

2. 原始经书和人为添加的成分之间的区别

信仰体系创始人的著述，有别于信徒经年累月所添加的非本质的仪式与习惯。后人添加的这些有的已经模糊了甚至歪曲了原始信息，使其主旨更加难以把握，更不用说其总体的演进目的了。这样混淆了真理也就遮暗了进步之途。世界信仰体系的创始人是——

人类的第一位教师。他们是普世的教育者，他们定立的基本原则是环宇进步的肇因和要素。后来漫延开的形式和仿制品无益于那种进步。相反，它们是上天教育者所奠定的人类基础的破坏者。它们是遮蔽实质之阳的乌云。^[2]

[1] Abdu'l-Baha,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 139.

[2] Abdu'l-Baha,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 85.

3.“经书”和某些宗教领袖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进一步加剧混淆的是某些宗教领袖的行为，通常是在文明的后期阶段，他们出于无知或对权力的热衷，固守着不合时宜的制度，这些制度必定要在新周期里升起的太阳面前消散。他们没有指引他们的大众朝向新光源，反而抗拒它，甚至鼓动迫害其创始人及其追随者。例如，犹太宗教领袖迫害耶稣；基督教领袖掀起了对穆斯林的迫害。这些都是明确的表征，显示该周期结果的时期正在逝去。

真正的宗教是人间的爱与契合之源，优秀品质的发展之因；但人们固守着仿制品和伪造品，忽视了那统合一切的实质；他们因此被剥夺而与宗教的光辉无缘。他们尊奉从父辈和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迷信。这迷信盛行若此，以致他们撇掉神明真理的天界光华，而坐在模仿和想象的黑暗中。本是要助长生命的，反变为死亡之因；本应是知识之明证的，现在成了无知的凭据；曾是人类本性崇高之要素的，却表明了其堕落。因此，宗教家的领域渐趋狭窄黑暗，而物质主义者的范围却拓宽并得到发展；因宗教家固守仿制品和伪造品，忽视并丢弃了神性，以及宗教的神圣实质。^[1]

信仰体系名义下的暴力和偏见，是对其原初宗旨的歪曲，并不能抹杀其价值；知识之火在孩童或无知者手里会是危险的。衰落腐朽中的信仰体系无法体现其价值；瓦解是衰落的表征，是一个周期所固有且必需的，周期会翻新而再度开始，聚集起新的强大力量。

衰败时期过后，转折点到来。强光逝而复返。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与时偕行，故无害。（《易经》，意译）

如果信仰体系是前后相续的，而前一个体系的生命力业已耗尽，我们就需要一个崭新的开始。倘若我们演进的下一步是人类家庭成为一体，则相应的，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契合我们时代需求的生机勃勃的信仰体系。

我们的世界近来紧密地熔为一处，以及过去一两百年间学识与发明

[1]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2, p.71.

急剧加速，都暗示着一个新的文明周期——首次以全球规模——已经开始了。倘若信仰体系会驱动人类成长的新阶段，则此突飞猛进的整合与瓦解背后的那股力量必定已然存在。它在哪里？创始人是谁？

这一更新的信仰体系必须是普世的，必须实现世界各地民众的宏愿，并有能力激发文明的全球勃兴，而各文化能在其中“以不断变化的模式相互作用”。它必须给予“人类心智……更为复杂而有效的手段来表达……其……固有的道德和理智能力”。该信仰体系的伦理规范应当是各个宗教所共有的“爱你的邻人”之基本主题的复兴；其社会原则必须涉及世界公民在这全球化的星球上的组织形式。

巴哈伊信仰

1863 年，一位波斯要员的儿子巴哈欧拉，在流放于伊拉克巴格达期间，宣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更新的信仰体系的开创者。他宣称自己要发出的是一系列递进的启示中最近的一个。他的核心讯息和目标，是人类的一体。

须把世界当作人的躯体，虽于创世之初乃健全完美，但由种种原因，染患了严重的失调与疾病。它未得一日安适，病情反而日渐加剧，因它历受无知医师的治疗，那医师任随己欲，谬误深重。若经一位精干医师的照料，躯体的某一部分一度痊愈，其余部分却罹患如故。全知者，全智者如此告知你等。

主所命定为医治全世界的极效药方与至强工具的，是世界众民联合在一个普世的圣道，一个共同的信仰中。除非经由一位熟练、全能、受启发的医师之力，否则绝无法实现此点。诚然，这是真理，其他皆为谬误。^[1]

1918 年，在致海牙和平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巴哈欧拉的儿子阿博都巴哈写道：

巴哈欧拉的教义之一是，尽管物质文明是人类世界进步的一个手段，但在它与神圣文明结合之前，想得到的人类幸福这

[1] Baha'u'lla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a'u'llah*, p. 254.

一结果，是不会达成的。思之，一小时的光景，这些战舰就能把一座城市变为废墟，这是物质文明的结果；同样，克虏伯炮、毛瑟枪、炸药、潜艇、鱼雷艇、武装飞行器和轰炸机——所有这些战争武器都是物质文明的恶果。如果物质文明结合了神圣文明，这些猛烈的武器就决不会发明出来。不，人类的精力会完全投入到有益的发明中，集中在有益的发现上。物质文明就像玻璃灯罩。神圣文明才是灯本身；没有光，玻璃罩便是黑暗的。物质文明就像躯体。无论它如何绝顶优美，典雅极致，它也是死的。神圣文明就像是灵，躯体由灵获取生命，否则它就成了尸体。因此显而易见，人类世界需要圣灵的气息。没有灵，人类世界就是无生命的；没有这灯光，人类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因自然界是动物的世界。除非人再次从自然界出生，即是说，超脱于自然界，否则人本质上还是动物；正是上帝的教义将这个动物转变为有灵魂的人。^[1]

根据巴哈欧拉曾孙守基·阿芬第所言，我们的成熟不仅仅是在阐明一个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有机改变，带来与其新状况相匹配的机制，亦即人类演进必然的圆满成就。

不要有任何误解。人类一体的原则——巴哈欧拉所有教义所环绕的轴心——绝非无知的激情主义之爆发，或模糊的虔诚希望之表达。不应把它的呼吁仅仅视同于再度唤醒人间兄弟情谊和亲善精神，它的目的也不单单是培育个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合作。较于任何古代的先知所得以提出的，它的内涵更为深刻，它的主张更加伟大。它的信息不仅适用于个人，它更首先牵涉到必定连结所有国家和民族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成员的那些基本关系之性质。

它并非只构成了一个理想之阐述，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

- 一个充分体现其真理、表明其有效性、并永保其影响力的机制。
- 它意味着当今社会结构的一次有机改变，这一改变世界从未经历过。

[1]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p. 27.

- 它构成了一个大胆且遍及全球的，对国家信条之陈旧口号的挑战——这些信条一度盛行，且必将按照天尊所设计并控制的一般情形，让步于一个根本不同于并无限优越于世界所曾构想之事物的新福音。
- 它所要求的不啻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重建与非军事化——该世界在其政治机关，灵性抱负、贸易金融、文字语言等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有机统一，而其联邦单位的民族特征依然无限多样。
- 它代表着人类演进之圆满——该演进最初始于家庭生活的诞生，随后的发展达成了部落的团结，接着导致城邦的建立，再后扩展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制度。

正如巴哈欧拉所宣示的，人类一体之原则恰如其分地赢得这一郑重声明的支持：达至这惊人演进中的这最后阶段，非但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其实现正快速临近，并且，缺少源自上帝的力量，无任何事物能成功地确立这一原则。^[1]

巴哈伊信仰承认上帝的一体和祂众先知的一体，坚持无束缚探索真理的原则，谴责一切形式的迷信和偏见。巴哈伊信仰教导，宗教的基本目的是促进和谐一致，宗教必须和科学并行不悖，宗教构成了和平、有序而进步的社会唯一而终极的基础。

“反复教诲两性享有均等的机会、权利和特权的原则，提倡义务教育，消除极端贫富，将本着服务精神进行的工作提高到崇拜的等级，推荐采用国际辅助语言，为奠立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提供了必要的机构。”^[2]

巴哈伊信仰是世界独立宗教中最年轻的一个。其创始人巴哈欧拉，被巴哈伊信徒视为上帝使者系列中最近的一位，该系列一直延伸到有记载的历史以前，包括亚伯拉罕、摩西、佛陀、克利什那、琐罗亚斯德、基督和穆罕默德。

巴哈欧拉的讯息其中心主题是，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其统一在一个全球社会中的日子已届临。巴哈欧拉说，上帝已启动历史性的力量，正摧毁着传统的种族、阶级、教条和国家间的樊篱，并将适时引发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地球众民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接受其一体性这一事实，并

[1]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a'u'llah*, p. 42.

[2] Shoghi Effendi, *Guardian of the Bahá'í Faith*.

协助统一的过程。

巴哈伊信仰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这一点的实现。体现着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约五百万巴哈伊组成的全球社团，正在为巴哈欧拉的教义付诸实施而工作。他们来自 2,000 多个不同的部落、人种和族群，生活在 235 个国家和附属地区。大不列颠年鉴（1992 年）称巴哈伊信仰是世界上地理分布第二广的宗教，仅次于基督教。

他们的经验将成为一个源泉，鼓励着所有同样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家族，把地球视为一片故土的人们。

2.4 与权威的关系的成熟

随着人类的成熟发展，大众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需要逐渐地摆脱以权威崇拜为导向的社会体系，走向以合作，承担社会责任为特征的成长型社会体系。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与西方存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体系和中国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体系。长期以来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 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迟早都要向西方的“民主方向”发展。但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运用东方的哲学理念，平稳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现任政府更是直接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尽力化解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这使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东西方在未来可能做到殊路同归。

在这里，我们仅从个人自由和党派制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个人自由

如果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基于相互负责和合作，那么这就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我们在 2.1 一节中提到，“如果我们接受个人能够从社会整体组织中受益，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

个人行为在强化了社会整体的同时也强化了自己。”

为了保证整体的利益，团体的权益应大于个人的权益。因此，个体的自由应基于了解社会整体关系并由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社会的能力。

自由的质量与个人的知识和训练有关，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对以下这段引文，中国人已是耳熟能详，乃至常常不用岁数来识别一个人的年纪，而是看一个人和自由的关系有多成熟。

三十来岁称为“而立”之年——立足坚稳的发展阶段；四十来岁称为“不惑”之年；五十来岁则“知天命”——明白命运的意义；六十来岁“耳顺”，能明辨优劣；七十来岁，“从心所欲”却不逾越规矩。人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经过毕生的学习过程之后才能达到的。自由有界限，它不应“逾矩”。

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使中国人具有冷静应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能力。尽管当今的中国的年轻一代非常崇尚“自由”，但根深蒂固的克己理念使他们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宗教组织成员有牵连的国家所发生的自我毁灭的暴力冲突大惑不解。同时也对美国允许个人携带枪支的法律很惊讶。

比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人遵守一个子女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这种严厉的措施来预防人口过多的后果。有谁感谢过中国的克己，因为中国控制了世界人口的数量？如果你在中国的城市里，在高峰时段挤过公共汽车，你就会切身体会到人们为什么能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尽管会有棘手的副作用，即一个子女的政策会助长溺爱孩童，并且会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子女，但中国依然坚持不懈。缺少社会福利体系，要在农村生存是很艰难的。生活要靠养儿子，因为儿子将来会留在家里。这一需求和一个子女的政策相冲突，导致了女胎的流产。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直到教育水平提高了，以及有更多的退休金规划就位。

中国人的克己遏制了那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颠覆行为，这种克己并非只是畏惧外部的威吓。中国人把领导者看作是由“水”即人民所支撑的船。人民懂得，水的目的应该是载舟的，而非覆舟。

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做法看作是维护自由之举，却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自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这些中国的传统经验更符合人类走向成熟的的方向。中国的克己文化在当今金融危机中，对比无限度消费的西

方文化更显得“可持续”一些。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以封建家长，长官意志为主宰的文化已经消亡，

实际上，中国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还很长。

党派制

在成熟的社会中，我们将从一种充满对立意识的体制转换到另一种和谐统一的体制。在新的体制中，取代对立竞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是通过公众参与，磋商调和，达到团体利益最大化。正如一对争吵不休的父母不能管好一个家庭，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可能由一个时时处于对立争斗的政府机构管理。

西方对民主的定义通常是指民选政府，以及多党制和不受约束的对政府行为加以批评的自由。多党制是出现于已追逐权利为目的的不成熟社会体系中。这种带有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系在防止滥用权力时是有必要的。但当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立以公正和团结统一为原则的新体系时，这种以对抗为基础的政府机制就淘汰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千百年来适应的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权力中心。政治体制中的“在野党“或”反对党“的概念是与其传统道德及知识系统相矛盾的。多党制对中国不单是一种外来的概念，而且可能引起国家分裂，甚至内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在中国向成熟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的对抗性多党制过程。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的传统道路，扩大和改进目前的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强化民众参与和磋商的过程，使之更具有民选的意义。

2.5 社团生活的成熟

在社会组织中有一个层面大于家庭而小于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团或社区”。我们在村庄、街区和中国的“单位”里能够体验到社团生活的一些方面。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是从权威式社会结构转变过来的，这些初级的“社团”是由村里的头面人物、有权势的人或者指定的人所领导的。朋友的圈子、共同利益集群、校友会、网友组织等都是一些社团的特征，但是没有实际的存在地点。

所有上述提到的组织都曾经或者仍然正在增进人类的成长和进步，但是现代世界的一些现状需要创造更成熟的形式社团。当我们的能力和教育不足时，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被领导者——好的或坏的——由上至下地管理。

随着教育的改善以及知识的迅速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快速的提升。相应的“参与和要求进步”的能力的增长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以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未知的潜能都能够被拓展，而新的社会和管理形式能够安全地导引这股新兴的能量。

随着社会模式更加地整合，我们需要身边有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表达和体验创造力、责任感以及携手合作。

社会发展由于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变得更加负责，高层次的社会单位如城市、国家和全球需要更广泛的草根阶层民众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这些现状，我们可以将社团重新定义为一个由个人、家庭和各类组织自发形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会创办各种机构和活动，其目标是大家一起为圈内和圈外的人提供服务以改善综合的生活质量。

中国习惯于群体意识，常常会说“集体”。虽然其渊源还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但这一观念由于大乘佛教强调通过救度群体来救度个人，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的集体感与和平倾向是构建社团的宝贵基础。

集体感针对的通常是家庭、朋友和全体中国人。目前的社会结构从较大的范围，如族群、国家和城市，一下子跳到了工作场所、家庭和个人这些较小的范围上。工作单位一度也是某种社团，但这一机制正在消失。城市、区政府、街道委员会等等各有一级行政单位，但它们更多的是行政的，而非社会的。还有一些小型社团，但仅限于老同学、同事以及家庭的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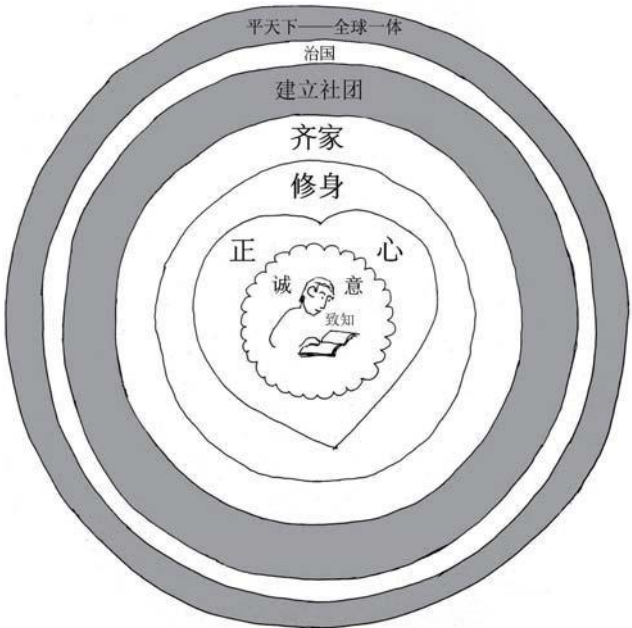


图 9.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本图在《大学》的描述框架中增加了“社团生活”一环

1935 年，林语堂（1895-1976）在他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指出，儒

家教义《大学》，贯穿了各层次的社会组织，独漏掉了社团。从国家到家庭的跳跃即可为证。团结和忠诚在这两个层次上还能发挥作用，但在中间层次上意义就弱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也许在过去，这些社会结构已经足够。孔子应该也会同意在社会的阶梯上再增加“社团生活”一环，因为当代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熟了。

中国开放以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能力的增强，不论男女。随着中国超越了专制型的社会结构而趋向成熟，亿万民众在自行决定如何将其能量和天赋疏导出来。人们自择教育和职业，自创生意，国内国外哪里有工作机会就去哪里。专业的服务态度开始取代家长作风。一个巨大的能量库正在形成，只待引流。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社会和管理机制来导引这股不断增强的个人的潜能，城市就会变得更有效率，城市生活也会极大改善。目前这种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外隐匿身名的状况，越来越多的城市区域被高墙和保安隔离开来，反映了对陌生人的恐惧，也是缺乏社区 / 社团的结果。我们需要离家较近的机构和外围来提供相互的支持与合作，就像家庭内或朋友的圈子内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带来利益和安全感。同样，在一个友好的、管理完善的社团层面扩展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的界限，将更大的拓展利益和安全感的范围。

对我来说，发展规划和策略的一个主要挑战便是，怎样创建一个全球化社会的机构群，一个将社会各个阶层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也能够互相联系的结构网络，使之逐渐成为全球所有居民都能够方便使用的共同财产。否则，我担心，全球化对大多数人来说恐将沦为边缘化的同义词。^[1]

[1] 法赞·阿柏博士，《实验室、庙宇，以及市场》 IDRC, 2001.

就这一社会层面的接触有很多怀疑和提防。即便是好人也会迟疑。隔绝和匿名的渴望主要来源于害怕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会提出无边的、不可控的要求；一旦你开始帮助某人也许就再也无法中止他对你的要求。

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在居民小区这个层面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相关的机构的发展以及社会质量和技巧的成熟，此类社团的延伸就不可能出现。信息的分享、需要和服务间的对接、信任的扩展，都需要在社团层面有新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力。

如果参与社会真正是生活的一部分，则城市的孩童可以参与社区服务，作为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让他们更亲密、更实际地敞开面对周围的社会，能开阔他们目前的“学习 - 家庭作业 - 电脑游戏”的活动范围。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明确的目的感。孩子们更容易想象如何把他们所学的应用到周围世界的需要上。对这种社会教育多加重视，还会让孩童有更多的代理兄弟姐妹可以交往，从而减轻独生子女家庭的困难。在服务中成长，这样的氛围也会减少自我中心。

青年能为社团的建设作出宝贵的贡献。目前在中国，青年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在强调分数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这很容易把他们与生活隔绝开，而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性成长。如果社团服务能够被认可，青年人可以参与到诸如低龄人的教育中，他们也会力行真正的服务，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其实他们已经为这种责任做好了准备，只是从未付诸使用。如果教育体系包括社团建设的参与，一些人力资源亦可从较强的学校向较弱的学校流动。这就将与现在这种过分强调学科分数而分裂各学校的状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学校间并不互相交流，反而是根据各校考入大学的人数来排名造成学校间的竞争。参与社团工作还会给予青年人以机会，不靠约会来了解异性。当你看到一个人怎样工作，怎样与他人互动，怎样行使责任等等，你会更了解他。

在基层社会里，创造和参加社团活动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机会，更会大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了解的深度。人们也会通过丰富活泼的社团活动，发现他们当中富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从而使日后的社会选举更为深入和更有成效。

中国的“集体”意识和和平的处世态度将是社团建设的宝贵基石。信任的圈子需要扩大。一个成熟的信仰体系的标志就是它能够有助于创建成功的社团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讨论社团问题。

在今天互联网与快速交通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同地方的社团可以有很多新的渠道相互交流。而社团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则逾越了它的地理范畴，从同一城市到世界任一城市。

从始于 1844 年的电报的发明开始，城市迅速地成为遍布全球的网络中的结点。主要的构成现代城市的技术因素出现于 1877 至 1889 的 12 年间。通过这些发明，城市得以朝着水平和垂直方向扩展；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时间能够轻易地延长到夜晚；人们在城市里或城际间的相互接触也大为快捷简便。

蒸汽机	1781
铁路	1800
电报	1844
电话	1877
白炽灯	1880
摩天楼	1880
有轨电车	1885
地铁	1886
汽车	1889
电梯	1889
无线电通讯	1901
飞行器	1908
电视	1920
计算机	1930
互联网	1980

图 10. 各种发明及其诞生的时间

尤其是随着国际电讯的普及，城市有了新的维度和目的，城市正变成整个星球网络的一部分。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础设施。城市，及其内部的社团成为所有个人据此获取世界资源的基础，同时为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努力。从理论上讲，城市越是发挥这种功能，城市的潜力就越能得到开掘和提升。

2.6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成熟

妇女能顶半边天。^[1]

世界过去一直由武力所统治，男人因身体和心智的品质更为强悍好斗，而凌驾于女人之上。但天平在移动，武力正失去份量，而女人所擅长的心智的机敏、直觉、爱与服务的灵性品质，正获得优势。因而，新的时代将是少些男性气质，而更充满了女性理想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男性与女性的文明要素更为均衡的时代。^[2]

只要专制型主导大局，妇女，就像少数群体一样，不得不去更了解男人，而胜过了男人对女人的了解。男人公然或无意间表露的专制的、传统的态度，会让女人受挫。对于中国妇女的高自杀率，这会有几分解释

^[3] o

妇女正在幕后等待，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好的机会来施展她们的潜能。中国有许多非常成熟精干的单身妇女，她们似乎不大可能找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者毛泽东主席的著名口号。

[2] Abdu'l-Baha, *Baha'u'llah and the New Era*, 1976 U.S. edition, p.156.

[3] 北京，1991 年的一天早上，我离开我在宣武门的家，看见人行道上有具女尸盖着塑料布，手伸在外面。她是从 12 层楼上跳下来的。人们说是因为她生了女孩，而她家人要的是男孩。

一位好丈夫，尽管男人的数目比妇女多。许多妇女嫁人好像是甘心要默默无闻地做丈夫的教育者。

男人假想的优越性还会继续压抑妇女的雄心。^[1]

这种不幸，其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更多地认同人类生存的性质基本上是合作的。男人还处于专制型的时候，妇女已经展示出整合型的某些特征了。

男人更被竞争、控制这些更属于青春期的态度和习惯所累。男人的成熟是自治、脱离他人、独立和个人成就。顾及人际关系与合作，好像是软弱的表现。^{[2][3]}

女人的确更有一种精妙的才能，可涵容他人的需要且轻而易举。我的意思是说，女人较男人更善于首先看出他人的需要，而后又深信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这让女人既能回应他人的需要，又不会觉得有损她们的身份感。

……服务他人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女人的生活就是围绕它组织起来的；男人就远非如此了……。

尽管任何社会都有竞争的一面，但社会要存在，就必须有起码的一点合作。（我把合作定义为扶助并增进他人的发展，同时推动自身发展的行为。）当然很清楚的是，我们尚未达到很高层次的合作生存。就现有的范围来说，妇女已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来维持合作生存。尽管她们不会为此大事张扬，但妇女在家庭中会坚持不懈地努力，以缔造出某种合作体系，能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虽然作为我们家庭基础的不平等前提大大阻碍了她们的作业，但总是妇女在笃行努力。^[4]

[1] Abdu'l-Baha,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US edition, 1982, p.76.

[2]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Harvard Press, 1982.

[3] 要在北京乘公共汽车的时候玩一种游戏，我从来不会输。那就是不看司机，猜猜司机是男是女。如果车子停了还往前倾，停车时刹车很猛，而且速度很快，我就知道司机是男的。如果加速减速平缓，速度适中，我就知道司机是女的。女司机不觉得自己是在赛车，非得争先；她们会考虑到站在过道里的乘客。刹车或启动太猛会把他们晃得站立不稳。

[4] Dr. Jean Baker-Miller,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eacon Press, Boston, Second Edition, p.62-3.

为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肩负了数世纪的责任，使得妇女作好了准备，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关键的贡献；她们更为推动当今世界的专制型向整合型过渡的社会而装备起来。建设更加亲和的社团生活，这一需求将为发展自我同时服务他人提供更多机会。妇女很有可能成为这一事业中的领导者。

.....直到最近，发展自我同时服务他人的机会还鲜有存在；实质上没有哪个社会形态可以将二者结合并举.....。对于男人来说，发展自我兼顾服务他人的情景，似乎复杂得无法可想。但对于女人却没有那么复杂。

传统的经济模型中，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充满了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独立的消费者，这已过时了。新的模型会将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群体的利益，家庭与社团的重要性都应在经济活动中兼顾到。而在这些方面妇女的经验恰恰可以做出出色贡献。^[1]

在我们成熟的新阶段，女童教育具有了新的重要性。经由母亲传给下一代，合作与服务的态度更容易传播开；如古谚所言，“教男教一个，教女教一家。”^[2]如果财力短乏而不得不做一个选择的话，女孩应比男孩更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即使纯粹从经济的观点出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为培训下一代而培训妇女“.....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投资相比，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打破贫困循环最有效的方式是投资女童教育。在低收入国家，让女童也和男童一样受到中级教育所花的费用，比起这些国家国防经费的 10% 还要少。低收入国家的父母未能在女儿身上投资，是因为他们没有指望女儿能为家庭做出经济上的贡献。”在中国农村，女儿会离开娘家住到丈夫家里。在短期内

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宝贵——于是女孩要留在家做家务

[1] Dr. Jean Baker-Miller,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eacon Press, Boston, Second Edition, p.62-3.

[2] Agnes Jung, *Unveiling India, A Woman's Journey*, 1987, p.92.

而让她的兄弟上学——这一预言就自圆其说了，却让妇女陷入了被忽视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出去赚钱，而能面对完全不同的一番选择。她很有可能少生孩子，但她能让孩子更健康，注重每个孩子的发展，保证女儿也有公平的机会。她女儿的教育又使得女儿下一代的女童更有可能和男童一样受到教育而且健康。恶性循环就这样变成了良性循环。^[1]

妇女的解放，两性间全面平等的实现，是和平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一，虽然对此少有公认。

否认这种平等便是对世界半数人口施行不义，并助长了男人的不良态度和习惯——它们从家庭被带到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并最终带进国际关系中。从道德、从实践或是从生物学上，都找不到任何依据能证明否认男女平等是正当的。只有当妇女在人类进取的所有领域里被迎入全面的伙伴关系中，才会营造出能让世界和平得以出现的道德和心理风尚。^[2]

教育妇女是消除和终止战争的有力措施，因为妇女会施展全部的影响力来反对战争。妇女抚养孩童，教育青年长大成人。她们会拒绝交出儿子去牺牲沙场。确实，她们将是促成世界和平与国际仲裁的最大因素。肯定，妇女将废除人间的争战。因为人类社会由男性和女性这两个互补的要素构成，除非二者都得以完善，否则人类的幸福与安定便无保障。因此，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和标准必须达到平等。^[3]

如果“中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资源和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如果妇女在迈向服务与整合型人际关系范例时首当其冲，则整个世界都应侧目于中国妇女——首中之首！

[1] Lawrence Summers, Chief Economist, World Bank. Essay for Scientific American, The Most Influential Investment, August 1992.

[2]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a'i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Baha'i Study Series No.14, p. 13.

[3] Abdu'l-Baha,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US edition, 1982, p.104.

2.7 文化的成熟

当下的历史暗示着，一个世界共同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而它正是世界被创造的目的。伴随着新信仰体系的到来而兴起的文化，曾把先前相互分离的民族联系起来。例如，佛教连接了中国和印度；基督教在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之前连接了中东和罗马属地；伊斯兰教连接了希腊、罗马属地和阿拉伯、波斯、印度以及中国。今天，全球各处都浸没在世界性的剧烈的文化交汇中，概莫能免。并且，在社会演进的每一步——从家庭、部落、城邦到国家——个人表达的机会和能力都得到了扩展，这暗示着随着我们进入世界文明的这个阶段，又有可能产生进一步的扩展。

那将是协同增效的创造性的交互作用，还是适者生存？中国文化将会怎样？

很像基因库在人的生物性的生命及其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财富浩瀚的多样性，对于正在经历集体成年的人类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财富所代表的遗产，必须得以在一个全球文明中结出果实。一方面，各

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被时下当道的物质主义势力所窒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文明格局中得能以交互作用，且不受党派政治目的所操纵。^[1]

中国革命成功地“废除长久以来的非正义的统治结构，为地球五分之一人口战胜赤贫，并扫清了根深蒂固的迷信习惯。”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些东西是要抛弃的。

要保存我们的民族性，须先确定它们能否保存我们。有特色的东西未必就好，为何非得保存呢？因为是中国的痼疾就要留着吗？（鲁迅，意译）

这一过程，时而猛烈，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质疑。

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恢复过来之后不久，正当旧帐被一笔勾销，正是在这一脆弱的转折点，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外国文化随即涌入。中国的现代化得到了明显的收益，可是她在文化、传统和精神生活方面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对于和其他文化交互作用，中国人的感受是复杂的。中国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被时下当道的物质主义势力所窒息”吗？进入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文化的行列既引起了恐惧也唤起了希望。

比如，李道增教授的以下言论就表达了前者。他们这些博学者的特殊贡献包括保存和研究了体现在中国古典和乡土传统里的广阔的民居资源，他们是文化基因库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看护人。李道增教授虽然希望古代文化能得到创造性的转化，但他看到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过程只导致了“冲突和妥协”。

“全球化”正在成为最新的思想潮流。随着经济、金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意义似乎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可是，“文化全球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将来世界的文化发展很可能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冲突和妥协、互动和对话的结果。……地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们要从上述的三个不同层面来理解传统的地方文化，并对我们的古

[1]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995.

代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目前的实践。^[1]

他和同事们相信，中国的文化资源中蕴含着很多物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则和解决办法，蕴含着一个浩瀚的精神激发和意识觉悟体系。到传统的乡镇和少数民族村寨旅行调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放松和灵感的资源。在这里，文化“基因库”的密度令人精神一振。其中还包含着手工技艺——它在现代建筑运动之前，一直是成熟的建筑语言不可或缺的成分。以进步的名义丢弃或毁坏这一财富令他们极为痛心。

在现代的语境中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风格，这个过程必定需要该文化基因库的资源。当研究要深入下去的时候，基因库的资源还会留下多少呢？

美术家和音乐家也有同样的担忧。例如，中国从事金属雕塑和油画的年轻艺术家杨冕，说外国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压迫形式，并导致了感觉的钝化。

不崇尚历史，不参与文化圈子，建筑在中国到处都是个一个模样。没有个性，没有地方文化传统。这不能归咎于政治力量。是我们的文化在受压迫并且变得迟钝，才导致了这种情形。我们城市的建筑工艺规程，只是开发商在不违反什么规定的条件下他们个人喜好的产物。开发商追求的是利润，要利用市场销售伎俩。我们只需要看一看我们城市里的所有房地产项目，就能发现它们全是一样的筒子楼，出现在广告里却打着“欧式”、“欧陆风格”、“罗马花园”、主题社区、高尚住宅、亲水园林等等旗号。（意译）

音乐家谭盾痛惜传统的消失，他要寻找一幅精神地图，以藉此挽回脆弱的民间乡土文化。尽管他看到现代化切断了中国的魂和根之间的联系，他还是在技术中看到记录和传播的手段，而有助于保存正在湮没的脆弱的文化元素。

北京【法新社】 1981 年，谭盾作为音乐学院的学生访问

[1] Li Dao Zeng, From an article called Global Localiza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published in World Architecture Magazine January, 2004, p. 85.

他的出生地湖南时，看到一位老人以石奏乐，对风而歌，这种萨满式的音响令谭盾颇为着迷。“他在进行他原始的歌唱：对天地风云倾谈，与往世来生对歌，”这位曾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说，“我惊呆了。”20年后当谭盾作为著名的作曲家再次来到村子寻找那位老人时，他伤心地发现，老人已过世了。“那老人给我的记忆太深了，美妙绝伦。可是突然间它就消失了，我意识到其他的每一样东西也在消失。”谭盾在一次采访中对法新社说。

这位居住在纽约的作曲家说，正在湮没的中国乡土民族传统，让他汲取了音乐灵感，也令他魂牵梦萦。谭盾说，在中国危殆的经济发展面前，乡土传统的泯灭迅如摩天大楼的拔起。“在每个地方，传统都在消失，”他叹息道。“这非常严重，因为在中国，发展来得太快了。发展令人目眩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保存文化和传统。”

为村里那位老人的离世所触动，谭盾决心用他的音乐来帮助保存他所热衷的脆弱的乡土民间文化。“肯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即使已经失去的东西，就像一幅精神地图一样，”他说。

谭盾深切的失落感激发他创作了多媒体作品《地图》：为大提琴、录像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古老和现代、视觉和音响的混合。去年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公演的这部鼎新之作，意在唤起对湖南少数民族濒临灭绝的音乐文化的关注。协奏曲展示了土家族、苗族和侗族演奏的传统笛箫和铙钹，吹树叶和轮唱——一种远距离传递人声的技法。

“《地图》是很个人化的旅程，……试图把东西追回来，试图让声音永恒，试图让传统永恒，”谭盾说。“我希望，技术要是能和传统结合起来的话，技术会变得人性化，并且能寻回传统。”谭盾说该作品也是他寻根的一次精神之旅。他说，“我试图找到另外的道路，一条看不见的途径，回到我在湖南的家”。

“在古代，你要凭借听声音来试着找出道路：那种感觉给人以强大的灵感。”他告诉北京的观众，他希望中国人在置身于快速现代化的时候，也能找到途径与他们古代的根相连。“我希望通过《地图》，人们能找到另一条回家的路，不是靠自行车，船或者飞机，而是循着看不见的道路回家——这条路连接着我们

的魂和我们的根，” 作曲家说。

农村人得不到鼓励去做别的，一有机会去附近正在发展的市镇上打工，他们往往会首先丢掉他们的传统。比如，在富一点的村子里，人们常常抛弃木头框架、砖墙和土瓦做的传统房屋，而要粉刷过的或贴了琉璃瓷砖的混凝土砖建筑。虽然结果既艳俗又拙劣，但他们的选择很明确：新型房屋更宽敞、干燥、暖和，能通电还有室内水管。并且，对他们来说，这看起来更“现代”。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持希望呢？在历史早期，约公元 200 至 800 年间，外来影响曾一度渗入中国，但其结果迥异。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有数百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窒息中国的精神，事实证明它反而解放了中国的精神。公元 800 年以后，它屈服于其物质上的成功，滥用其权力，并受到压制，它的影响就衰退了。以下论及的是佛教的正面影响时期，虽然说的是建筑艺术，但也同样适应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中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念慈教授描述了这一过程。

始自公元四世纪，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碰撞融合，由于佛教东传导致了中国建筑的可观巨变。在印度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建筑文化的唐宋时期（6-13 世纪）。当时的建筑大师，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并未采取机械移植外国有生力量的方式。相反，通过消化吸收，他们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些新东西。……接着，“……日本的许多古建筑强烈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假装这就是日本的特色。”（意译）^[1]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基督纪元伊始。虽有记载，早在公元三世纪之初就有佛塔建造，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五世纪中叶以前的佛教遗址了。然而，从那时起，直到十四世纪后期，中国建筑的历史便主要是佛教（和少量道教）寺庙和宝塔的历史了。”（意译）^[2]

因早期的这番交互作用颇具创造力，戴教授希望它能再度发生。

[1] Professor Dai Nian Ci, Paper presented at Qinghua conference,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One of the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Asian Architect, September 1989.

[2] Liang Se Cheng,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IT Press, 1984, 3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创始人梁思成，说佛教启发了中国的美术和建筑。他在《中国建筑图画史》一书的序言中说：

读者不要奇怪，这里呈现的绝大多数建筑实例，是佛教的寺庙、宝塔和墓冢。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宗教都为建筑创造，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

所有这些先例都使我相信，在接受西方建筑技术的同时，亚洲当代建筑师能够凭借消化、吸收和融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他们自己独特的建筑新文化。

亚洲国家大多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有自身的古代文明。由于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别，民族和种族的不同，及历史进程的迥异，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它们都有过辉煌的时刻，但后来（也许日本除外）由于各种原因都落后于欧洲国家。随着我们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到了后半叶，我们再次投身于同样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先进的思想和经验。那么，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何以在这里交汇；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后就是某种程度的融合。

我相信，由这些冲突融合，将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新文化。它们将成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颇具价值的一份子。（意译）^[1]

吴良庸教授痛心于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消蚀。

在强大的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20 世纪经历了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消蚀，即地域特征的消蚀，其结果就是城镇的灵魂失去了视觉上的定位。（意译）^[2]

他把文化指称为灵魂，一个地方的精神。虽然文化多样性在消蚀，他也看到了充满活力的建筑家们在受到另一种文化的滋养后回到了他们的本土，创造出杂交以新元素但仍反映着浓厚地方文化的现代建筑。

[1] Professor Dai Nian Ci, Paper presented at Qinghua conference,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One of the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Asian Architect, September, 1989.

[2] Prof. Wu Liang Yong, Looking Forward to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Millennium, Keynote Speech for the XX UIA Congress, Beijing 1999

这种情形令他萌生了希望。

与此同时，20 世纪也看到了根植于地方的建筑勃兴，增添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丰富性。20 世纪初，各国营造的建筑师来到北美想做番事业，包括萨里南在早些时候，格罗皮乌斯和密斯·范德罗在战后来到了北美。这新兴的国家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美国的一些建筑师，像莱特，来到亚洲领受东方文化的养分，回国后开创了他自己的美国风建筑。同时，亚洲的一些建筑师去西方学习，然后回到本国来发挥自己的天赋，例如，日本的槇文彦 (Fumihiko Maki)，印度的柯里亚 (C. Correa)，和中国的吕彦直、梁思成等等。

这都表明了可以吸收不同的文化来作为地方新文化的成份。同时，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也表明他们不是和周围环境相隔离的。所以世界是个大花园，花卉杂交可以创造出时代的新品种来。(意译)^[1]

为了提高这一杂交过程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他建议：

我们应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地方(文化)多样性。(意译)^[2]

如同佛教影响中国的情形，哪里有精神性的影响，哪里就有促成中国文化繁盛的那种消化、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当前对全球化的疑惧，是由于发觉了“物质主义消费至上的文化入侵”这一缺乏心灵因素的过程。在相互尊重和吸引的状况下，文化交互能催生出无穷的创造性嬗变。无情的物质主义标准将大量的文化表现形式打入了“落后而毫无价值”的冷宫。

要义在于，没有一个精神的基础，全球化必将导致冲突和妥协，而“文化全球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家庭，它被一系列诱发文化的信仰体系所驱策而步入成熟之途，或者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其生命力仰赖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基因库”，那么，

[1] ibid

[2] ibid

要紧的是要找到谭盾的“精神地图”，作为由精神所激励的发展的一个根基。

就像人体一样，在一个活的系统中，整体维系着部分的生存。用生态学上的协同增效来作比喻，则意味着社会、经济、技术、智力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任何方面缺少了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文化景观好似河流和海洋。各种地方风味位于河流的上游；同时，它们哺育着全球文明的海洋。维持生命的水，从海里蒸发后又回来更新地方景观。输入的品种越丰富，整体的美和力量就越宏大。

基于一个世界性的信仰体系，并视人类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新世界体制，必将重视其文明的构成要素，并需要发挥成年人相互尊重、欣赏、甚至热爱彼此的差异、以及在创造性的协作中相互信任的能力。动力来源于统一的视景，比如中国人说的“天下一家”，多样和差别只会使一座“花园”更美丽。

中国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不仅会与世界分享她自己的遗产，而且会引发李道增教授所希望的“我们古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精神所激励的人类社会中交互作用，最终可能是保存和振兴中国文化遗产的唯一希望。

2.8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成熟

环境危机也表明外部现实和我们内在视景之间需要平衡的动态关系。

.....事实证明，正在被复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如此有害于环境，必须对其存活能力提出质疑。通过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来给世界所有民众带来繁荣，这一挑战不能只凭借应用技术和调整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来应对。它要求彻底离弃物质主义哲学——此类哲学造成了今天潦倒的贫困与不负责任的富裕并存的局面。^[1]

自然的承受力能无限地满足人类的任何要求，基于这一信念的理论，其谬误现已无情地暴露出来。一个极端重视扩张、获取、以及满足人民需求的文化也不得不承认，单靠这些目标本身来导出发展方针是不现实的。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一些美德和态度，诸如中庸、平衡与协同，长久以来为中国的哲学家和圣贤所体认。中国的美术家在广阔的山水画里把

[1] Dr. Farzam Arbab, *The Lab,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 Edited by Sharon Harper, IDRC, Canada, 2000, pp.1-2.

人物描绘得很小，反映出对自然的敬畏、谦卑之情，和对美的尊崇。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第四十六章》)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第八十一章》)

虽然后来，中国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占有大大增多了，但中国还是展示出许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中国人的实用、中庸、节俭，产生了土地利用的最佳效果，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处于食物链低端的饮食习惯。中国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可持续的特征是其最佳的疏密度（不太密，也没有铺得太开）。自行车广泛地用作了交通工具；几乎都是朝南建房以吸收太阳能；私营的非正规的纸张、玻璃、塑料、器具和家具回收颇为广泛；为初创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孵化器”建筑。还有自愿的节育，至少是在城市地区。

然而，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暗合，比起自觉之举，更多些侥幸。随着财富的增长，最佳城市结构和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还会被侵蚀，除非环境意识和教育增强。“富裕舒适”这样的普通志向，可能会侵蚀并抹除现存的可持续特征。

2.9 决策制定的成熟

磋商

巴哈欧拉倡导的“磋商”程序，是重新构思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巴哈欧拉的忠告是：“凡事必要磋商。……天赋之领悟力通过磋商才变得成熟。”

在追求真理方面，“磋商”所要求的标准，远远超越现在商议时经常采用的谈判及妥协方法。现时在社会上盛行的“抗议文化”，不但不能成功地追求到真理，反而是这过程的严重障碍。磋商的目的是使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对个中的真理达到一致的认识，并在任何时刻能够选择最明智的行动。辩论、宣传、抗衡方法及派别组织等长久以来常常被使用的集体行动方法，都是有损这目标的。

巴哈欧拉提倡的磋商过程要求参与者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员，将全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个人的观点之上。大家在坦率及礼貌的气氛下进行讨论。各方所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归于集体所有，任由集

体来决议取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成功的大小，是看在什么过程上，参与者不论本身在磋商时最初有怎样的意见，而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发现一项决议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重新考虑。

如此来看，磋商是人类社会事务中履行正义的具体表现。磋商是集体努力成功的关键，因此是所有可行的社经策略不能缺少的基本部分。诚然，只有在每个社经计划上以磋商作为策划原则，人民的参与才能有成效；而社经策略的成功则是有赖于参与者的投入与努力程度而定。巴哈欧拉的明训是：“只有履行正义，人才能提升至其真正地位。只有通过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只有经由磋商，才能获得福利与幸福。”^[1]

注：以下这些材料是给中国的社会工作者们准备的，着重谈了共同磋商以及家庭生活。我们读这些材料时，可以将文中的“家庭”替换成团体企业、组织、婚姻、议会等，以适合你的需要。

进行共同磋商需要有成熟的素质，它培养和促使人们用成熟的态度来互相对待，并得到逐渐走向成熟的锻炼，要达到这样的成熟磋商，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建立目标对成功的磋商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目标应是发掘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路径，如果参与磋商的成员动机不在于此，而在于获得或保持他的权力，赢得这场争论或仅仅是为了挽回面子，这些动机只能阻碍磋商的正常进行，而磋商也不可能成功的达到应有的目的。

成功的磋商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素质。而进行共同磋商是帮助人们发掘并获得良好的素质。

纯洁的动机，为他人服务的愿望、耐心谦逊、开放的心态（自愿为作出最好的正确决定而抛开个人的喜好恩怨）和训练有素的思维方式（具备识别和及时采用正确原则的能力）。彼此之间正确的尊重可以通过言语和行为表达出来，没有尊重亦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不可能很好的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威胁与恐吓压制了胆小温顺的人。蛮横无礼招致怨恨。同样的一个家庭为了解决家庭成员中出现的問題，不能持僵持态度。团结的思想和行动建立在彼此接受差别的基础上，而不是互

[1]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Part III.

相否认和反对，家庭成员彼此苛求一致性就和个人身上的那种自高自大，自我中心主义一样不受欢迎。

以下所列是成功磋商必备的几个因素：

- 建立全部的事实
- 决定采用的原则
- 讨论问题
- 做出决定并且使成员团结统一地去执行

家庭中的谈话成过于散漫或抑制。当我们就一个敏感的决定需要磋商时，根据共同磋商的原则及过程，自我约束和合理程度的自由便能达到和谐一致。

因为没有自我约束也就无所谓自由，存在的只是控制与服从的关系。

建立事实

有些家庭的磋商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能同意所列举的事实而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坚实可信的事实证据，而是参加磋商的家庭成员们仅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就会拒绝接受不利于他们的事实情况。

原则

原则上为使磋商顺利进行，成员们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对即将采用的原则达到基本统一，在一个团体中执行正义，表达彼此间的关爱，是统一的基础。

讨论

磋商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统一的目标，而不是意见的一致。不同意见的冲撞往往会迸发出真理的火花，因为意见的不同决不是人们性格上的冲突。

每个人都应该充分表达他的意见，并且确信自己的意见对整个讨论是有所贡献，每个人都应坦诚，礼貌、谦逊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羞涩的人鼓起勇气直舒己见。而自我滔滔不绝的人应该注意简短和应自我控制。

我们应该以开朗的态度倾听所有的意见并对之做出公正的判断。大声吵闹、冷嘲热讽以致漫骂都只能让彼此产生敌对的情绪并掩盖了真理。妨碍磋商正常进行。选取一位主席来主持磋商保证所有人都参加

讨论认真听取别人意见，且就意见本身讨论，保证无任何人控制或随便转化讨论的方向。这对磋商是大有帮助的。

对参加磋商的团体来说，每一个意见都是朋友呈送的礼物。我们不应该把意见与提出意见的人同一而论。即，这个意见可以被修正，发展甚至于被拒绝而不致于伤害任何人的私人感情。如果参加磋商的朋友采取了正确有效的方法，无论他们最初的意见如何，他们将看到最终采取最有效行为的过程，如此，在磋商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完全改变他最初的意见而不觉得失了脸面。实际上这是一种成熟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最有弹性，敏锐的发掘，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技巧。

显然，一个正确的磋商目标可以为灵性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而这种灵性的素质对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是大有帮助的。

做出决定

如果共同磋商的过程进行得顺利，那么做决定则是最容易的一环。这决定必须也是一个一致性的决定。如果磋商中达不到这种一致性，那就应该以大多数的意见为准。每一位成员都应当尊重这一磋商团体所做的决定，即便他不赞成最终的决议，也必须以服从和完全信赖的态度去执行。

统一

统一本身就会使大众受益。假如一个决议不能被统一地服从执行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这个决定本身的错误还是意见分歧造成的流产；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的去执行，即便决议是错误的，也会很快被发现，并得到及时的修正；决定是正确的，则它的受益会马上被感觉到。

附录：文明与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

本书曾经简略讨论了佛教和巴哈伊与人类社会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灵性推动力总有“文明”响应紧随其后的现象，特别是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响应。

犹太教

那时，以色列各部落四散漂泊，摩西召集、联合并教育他们，因而他们获得了高度的能力和发展。摩西使他们由卑下转为荣耀，由贫穷变为富有，去其恶行而代以美德，直到他们达至鼎盛——使得所罗门统治的光华展露，他们的文明也名扬东西各方。

比如，苏格拉底从希腊而来，求教于犹太学者。当他返回故国，却因宣扬自己在以色列学到的观念，即“一神”和灵魂不灭的思想，而被迫自杀。^[1]

基督教

耶稣到来之时，犹太文明已然衰败。他说，他来是要：

聚集摩西的那些迷途的部落或离散的羊群。他不仅牧养以色列的羊群，还召聚了迦勒底、埃及、叙利亚、古亚述和腓尼基的民众。这些民族深怀敌意，凶如猛兽，极欲彼此相残；但基督将他们集合起来，凝聚团结在他的圣道中，并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爱的联系，以致他们抛弃了仇恨和战争。^[2]

[1]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2, p.22.

[2]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2, p.22.

在数百年间，他的教诲所启发的文明显现出来。

那时，基督徒优秀品格的明证之一，是他们献身于博爱善举，并创办了医院和慈善机构。比如，整个罗马帝国第一个建立公共诊所，让穷人、受伤者和无助者接受医疗的是康斯坦丁大帝。这位伟大的君王是第一个拥护基督圣道的罗马统治者。他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推广《福音书》的原则；以往罗马政体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压迫体制，而他将其牢固地建立在适度和正义之上。他蒙福的名字如同晨星光芒四射，穿透了历史的黎明，他的地位和声誉归于世上最高贵、最文明的人士之列，至今仍被各派的基督徒所传颂。^[1]

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医生兼哲学家伽林，就国家的文明写过一篇论文。他不是基督徒，却证实了宗教信仰对文明的症结所发挥的非凡功效。他基本上是说，‘我们当中有一群人，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追随者，耶稣已在耶路撒冷被杀。这些人确实浸透着令哲学家羡慕的道德原则。他们信仰并敬畏上帝。他们寄望于上帝的恩眷，因此避免了所有不足取的行为举动，而倾向于值得赞美的伦理道德。他们终日奋力以求行为可嘉，以求促进人类福利；故而实质上他们人人都是哲学家，因为这些人已深得哲学的主旨精华。这些人的道德令人赞叹，即使有的还不识字。^[2]

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宇宙具有和谐结构，凭借中心、圆形和球体的数学符号可理解上帝……这些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新生，并从视觉上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上。……建筑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来说，其严格的几何结构，均衡和谐的风格，平和安谧的外形，最重要的是其球形的穹顶，都在回荡着，同时揭示着上帝的完美，万能，和仁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深信，宇宙的和谐，除非在空间上，通过为服务宗教而构思的建筑来加以体现，否则就无法完全展示出来。^[3]

[1] 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 85.

[2]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2, p.56.

[3] Rudolf Wittkower,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1998, Academy Editions, p.39.

伊斯兰教

当耶稣的影响力开始衰退，欧洲进入千年的黑暗时期之际，穆罕默德出现了。其间，在南方，阿拉伯的游牧部落……

四处流散，在没有法律的状况下生活在沙漠里，各部落间冲突流血不断，没有哪个部落能免遭攻伐毁灭的威胁——值此危难关头，穆罕默德出现了。他把这些野蛮的沙漠部落聚集起来，使他们和解，团结一致，因而停止了敌对战争。阿拉伯民族迅即崛起，直到其疆土向西拓至西班牙和安达卢西亚。^[1]

那至高先知之火焰在麦加之灯里燃起以前，未开化的汉志民族在地球的所有民族当中是最粗野蒙昧的。他们凶残，习性顽劣，且世代结仇，在各种历史记录中皆有据可查。那时，世界上的文明民族甚至不把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部落当作人类看待。……这些部落如此蒙昧难驯，在无信仰时期，他们甚至会活埋自己七岁的女儿……。然而，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后，因由完美之矿藏…施与他们教育，神明律法赐予他们福佑，他们在短期内便聚集在神性一体之原则的庇所中。随后这粗野的民族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人性完美与文明，令他们的同代人大为惊异。一向嘲笑奚落阿拉伯人为毫无见识之辈的那些民族，现在却热切地寻觅阿拉伯人，访问阿拉伯国家以期获得启迪和文化、技术技能、治国之道、艺术科学。……这粗野卑劣的一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攀升至人类完美的最高峰，这是穆罕默德先知身份之合法性的最伟大的证明。^[2]

欧洲受惠于伊斯兰教这一事实，而今更为人知并已被公认。伊斯兰教把欧洲带出了黑暗时代，并推向了文艺复兴时期。

以罗马为中心画两条线，一条向东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一条向西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几乎所有位于这两条线以南的地中海国家，在我们所说的时代（约公元 900 年），都生活在“真主独一，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信条中。现在我得讲讲这两条线是怎样向欧洲推进的：东线是凭借军事力

[1] Abdu'l-Baha,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2, p.23.

[2] 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ages: 87-8.

量，西线是凭借理智力量。两条线以罗马为轴心转动；时而张开时而夹紧，一时危胁要从两端弯过来，把变异的基督教世界攥在掌心；一时又因它们围起的列国最后的阵痛，而各自退回并全线震颤，但只后退片刻便又夹得更紧了。似乎有看不见的手臂从非洲炎热的沙漠伸出，要把欧洲拢在掌中，试图合起手来给变异的基督教世界“以可怖而致命的一压。虽然遇到挣扎抗拒，但那不祥的手最终还是攥紧了。从历史上看，我们说就是那时的压力促成了改革。^[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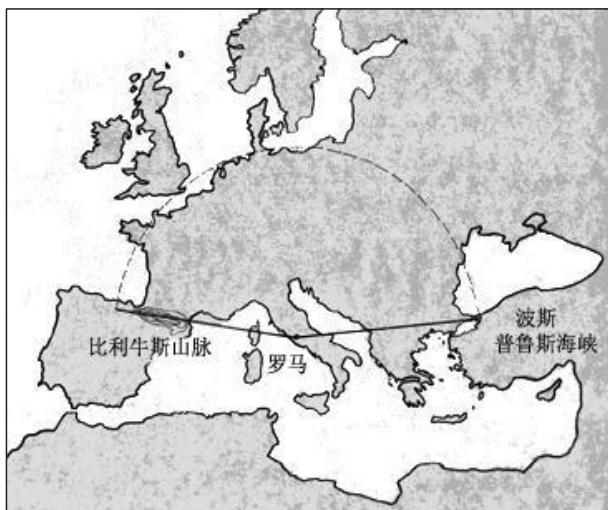


图 11 欧洲与地中海地图

[1] 杜雷波使用了“变异的基督教 (paganizing Chistianity)”一词，意指基督教在穆罕默德的年代里所处的状况，那时，基督教已从康斯坦丁的荣耀时代跌下，约在公元 500 年后，落入实利主义的腐败领袖的掌控中。

“感谢那些起身传扬《福音书》之教义的神圣灵魂的训导，一个何等牢固的优秀品格的基础（在康斯坦丁的时代）奠定下来。多少小学、学院、医院，以及能让失去父亲的穷困孩童接受教育的机构得以创建，多少人牺牲了个人利益而献出一生的时间来教化大众‘以期获得主的喜悦’。

“然而，当穆罕默德的灿烂美质即将破晓世间之时，掌管基督教事务的权力已落入无知的教士手中。自神恩之域轻拂的天堂微风已然沉寂，伟大福音的律法，奠立世界文明的基石，均荒废无果。这全是由于滥用，以及看似皎好而内里污秽之人的行止。

“欧洲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全面描述早期、中世纪和现代的状况、风俗、政治、学识和文化时，一致记述道，从基督纪元的六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的十个世纪所构成的中世纪期间，欧洲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极端野蛮黑暗的。其主要原因是那些被欧洲民族称作灵性和宗教领袖的僧侣，已丢弃了服从神圣的诫命与天降的福音教诲方可获得的持久荣耀，而与当时暴虐专横的世俗政体之统治者串通勾结。他们闭目不视永恒的荣耀，竭尽全力增进彼此的世俗利益和转瞬即逝的好处。最终乃至大众成了这两个集团手中的绝望囚徒，而这一切导致了欧洲各民族的宗教、文化、福利与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ages: 85-87.)

[2] John W. Drape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Harper and Brothers, 1905 edition, pp.1-2.

西线凭借理智力量：

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欧洲各民族便从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的居民所实践的伊斯兰教中获得了文明社会的科学和艺术。全面细致地考查历史记载，就会确定这一事实：欧洲文明的主要部分来源于伊斯兰教；因为穆斯林学者、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所有著作，都逐渐在欧洲得以收集，并在教学中心和学术集会上经过缜密周详的考量辩论，之后便对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加以利用。今日，大量穆斯林学者的著作在伊斯兰国家已无迹可寻，但却能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找到。并且，通行于欧洲各国的法律和原则整体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来源于穆斯林神学家的法学著作和法律裁决。^[1]

那些熟知欧洲史实，以真实和正义感而特出的欧洲知识分子一致承认，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们文明的基本要素都来源于伊斯兰教。

……作者（杜雷波）指出了整个欧洲文明——其法律、原则、制度，其科学、哲学、各种学识，其文明的礼仪习俗，其文学、艺术和工业，其组织、纪律和行止，其可嘉的品格特性，甚至法语的许多通用词汇，是如何源自阿拉伯的。他对这些要素逐一详加考查，甚至点出了每项要素从伊斯兰传入的时期。他还描述了阿拉伯人来到西方，来到现在的西班牙，如何在短时间内便在那里建立了发达的文明；他们的管理体系和学术杰出到了何等的高度；他们如何稳固地创建并良好地规范了学校和学院，以教授科学和哲学、艺术和工艺；他们在文明的艺术方面如何携领风骚，又有多少欧洲显要家族的子女被送往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托莱多的学校，以求取文明生活的科学和艺术。他甚至记述了一个名叫格尔伯特的欧洲人来到西方，就读于阿拉伯辖区的科尔多瓦大学学习艺术和科学，并在返回欧洲后如此腾达，最终晋升至天主教会领袖的地位而成为教皇。^[2]

[1] 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 89.

[2] 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ages: 92-4.

东线凭借军事力量：

欧洲文明的开端要追溯到伊斯兰纪元七世纪，具体情况是：回历五世纪将近结束时，教皇或基督教的领袖叫嚣说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等基督教的圣地已落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煽动欧洲的国王和平民发动一场他所谓的圣战。他的喧嚷激昂甚嚣，使得欧洲各国皆尽响应。参加十字军东侵的国王们率领无数军旅越过马尔马拉海向亚洲大陆挺进。那时，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统治着埃及和一些西方国家，叙利亚国王也就是塞尔柱王朝的君主大多数时候也臣服于他们。简言之，西方的国王们带领无数军队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叙利亚的统治者和欧洲的国王持续争战，为时两百零三年。欧洲援军不断加入进来，西方统率们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并夺取了叙利亚的每座城堡，而伊斯兰的国王们又一次次地将它们夺回。最后，萨拉丁在回历 693 年（公元 1315 年）将欧洲的国王和军队逐出埃及和叙利亚沿岸。他们一败涂地，回到欧洲。在十字军东侵的这些战争中有数百万人丧生。总之，从回历 490 年（公元 1112 年）至 693 年（公元 1315 年），欧洲的国王、将帅和其他领袖不断往来于埃及、叙利亚和西方之间，当他们最终全部返回家园时，便将他们在两百余年间在穆斯林国家中观察到的一切引介到欧洲，诸如政体、社会发展、学识、学院、学校和雅致的生活方式。欧洲的文明便从那时开始了。^[1]

伊斯兰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桥梁。

穆斯林们在引用一句圣训时充满自豪“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它指出了寻求知识的重要，即便意味着要远途跋涉直至中国，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中国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 ‘Uthman ibn Affan (Allayhi Rahma) 哈里发即第三个哈里发时。打败了拜占庭、罗马人和波斯人后， ‘Uthman ibn Affan 在回历 29 年（公元 650 年）先知离世后十八年派了一个使团去中国，在先知的舅

[1] Abdu'l-Baha,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Baha'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Pages: 90-1.

舅 Sa'ad ibn Abi Waqqaas (艾比·宛葛素 Allayhi Rahma) 的率领下，邀请中国皇帝加入伊斯兰教。在此之前，阿拉伯商人在先知在世的时候已经将伊斯兰教带入了中国，尽管不是有组织的活动，尽管只是他们在丝绸之路（陆地与海上）上旅行的分支。

尽管在阿拉伯的历史上对此事件只有零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有简要的纪录，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国遣使第一次来华，抵达长安（今西安），参见唐高宗李治。中国的穆斯林将此事定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

据传皇帝敕建中国的第一座清真寺——位于广州的“怀圣寺”。十四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完好。中国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是建在广州这个港口城市。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共派遣过六个使团到中国，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定居中国的穆斯林最终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和影响。

在宋朝（960-1279）它们几乎控制了全部进出口贸易。

事实上，那段时间的市舶使职位一直由穆斯林把持。明朝（1368-1644 CE）一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穆斯林也完全地融入了汉族社会。^[1]

[1] <http://chinese-school.net/firms.com/Muslims.html>

结束语

我来自加拿大，已经在中国（主要是北京）生活了 23 年。我的妻子何红雨是中国人，我的两个儿子 13 岁和 18 岁，都在北京长大，并在当地的学校念书。我最开始在天津大学教建筑设计，后来一直在北京做建筑师。

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或学者，但在这里的经历促使我将自己关于中国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初到时，我见到的是一个感觉陈旧的、较为传统保守和缺乏自信的中国。二十多年来，我和这里的人民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国向一个更自信更向全球开放的转变过程。中国的崛起和我们所面临的创造和平统一新世界的挑战绝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必然。

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是一个信号，它显示出人类在成熟过程中面临的深层精神危机。我们必须从不成熟的分裂走向成熟的联合。从我阅读到的中国哲学，诗歌和宗教作品中，从我见到的中国人当中，我感到中国恰恰应对世界走出危机有所贡献。

本书的前一部分主要是陈述了这一观点。后一部分探讨了关于包括中国在内，我们都要经过的成熟过程。当然，关于成熟的很多范畴我们可以添加进来，比如婚姻，家庭，教育等。同时，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更深的探讨。我在这里提到的想法主要还是在原则层面，

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来研究现实中的实施策略。我也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对解决这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不同的原则，但我希望我在这里所展示的能对大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材料。

昨天晚上，我的大儿子，他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年纪新生，给我演示了他和他的小组将要在课堂上做的报告。题目是“核武器：它是避免战争的威慑物吗？”这个题目主要是针对印巴核冲突的。他们的结论是，在理性世界中，应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来避免相互攻击是有逻辑行的。但从太空看，国界是不存在的，是一种人为概念。从这种角度看，依赖于使用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新一代的想法进化到这种水平，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Joe Carter

2009-03-01